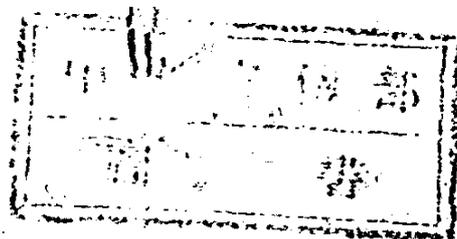


新中國文化叢書第一輯

蔣委員長的思想體系

殷作楨著



新中國文化叢書社發行

殷作楨編著

新中國文化
叢書第一輯

蔣委員長的思想體系

187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印行

目 錄

自序

第一章 哲學思想

一 唯行論

二 宇宙觀

三 人生觀

第二章 倫理思想

一 大學中庸

二 四維八德

三 習三勇信

第三章 政治思想

一 國家論

二 民本論

三 仁政論

四 行政論

第四章 經濟思想

一 論生產

二 論流通

第五章 教育思想

一 國家教育

二 人格教育

三 文武合一教育

第六章 軍事思想

一 戰爭認識

二 治軍要領

三 軍紀合義

四 作戰要訣

第七章 結論

自序

在拙著「蔣介石傳」的自序裏，著者曾經這樣寫着：

「這是一本純粹的傳記，其中未涉及蔣先生的思想的研究，因為我正在計劃寫一本關於蔣先生思想之研究的書，寫成後可作本書的姊妹篇來讀。」

「蔣介石傳」一書在兩月間銷去兩版，計一萬冊，三版出書未及發行，不幸廣州陷落，全部損失。著者在失陷前一日下午四時，才隻身狼狽出走。如今，廣州失守已經一年半了，而著者爲生活到處奔波，關於研究蔣委員長之思想的書始終不曾動筆。直到最近，從西安歸來，才給我一個機會，寫成了這一本七萬字的「蔣委員長的思想體系。」

本書計分哲學思想，倫理思想，政治思想，經濟思想，教育思想，軍事思想六章。把蔣委員長的全部言論歸納在這六種思想裏來敘述，雖說尙嫌未能精微詳盡，然而大體上是不會錯的，蔣委員長的重要的思想都已經包括進去了。蔣委員長哲學思想的中心是唯行論，由於這唯行的觀點來說明宇宙和人生，他的宇宙觀和人生觀是根據唯行論而確立的，有了這種革命哲學做基礎，於是再在這基礎上建築起其他的思想——倫理思想，政治思想，經濟思想，教育思想，軍事思想等等。無論在倫理，政治，經濟，教育，軍事那一方面，都沒有離開一個「行」字。

友人看了這本書的章目以後，說是必須再加上黨義思想和黨務思想這兩章。驟然聽

來似乎頗爲言之有理，但仔細一想，那是很不妥當的，蔣委員長的各部思想，沒有不是根據總理的各部黨教發揮出來的，他的思想的中心——唯行哲學，就是根據總理的一知難行易——學說而發揚光大的，從這中心思想再演繹開其他的思想；其他如倫理思想是根據總理「民族主義」講演中的固有道德和「軍人精神教育」，政治思想是根據總理的「三民主義」，經濟思想是根據總理的「實業計劃」，因此，黨義思想沒有另立一章的必要。至於黨務方面的言論，不外乎是如何實現主義，如何救黨，如何改進黨務等等，但是蔣委員長的各部言論都沒有離開實行主義和救黨救國，所以加上黨務思想一章，也是多餘的。同時，黨義思想和黨務思想也似乎劃分不出明顯的界限來，如果加上這樣的兩章，只有感覺到重複和累贅的弊病，顯見得對於蔣委員長的思想還沒有透切的研究和理解。

又有一位朋友說本書沒有討論到蔣委員長的抗戰言論，這是不應該的。然而這位朋友却不會明白，著者是在研究蔣委員長的思想體系，並不是在選輯蔣委員長的言論集。若是後者，那末沒有選上抗戰言論，確是極大的缺點。但是本書雖未另章討論抗戰言論，而蔣委員長的抗戰言論，無論是軍事政治經濟教育各方面以及抗戰建國的道理，也完全是根據總理的黨教，根據他自己的唯行哲學爲出發點，這在本書裏都已有基礎的論述了。

分爲哲學，倫理，政治，經濟，教育，軍事六部分來研討蔣委員長的思想，大概是不会有什麼遺漏了的。

二十九年四月十七日，夜深於成都

第一章 哲學思想

一 唯行論

蔣委員長在「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中說：「我起初相信『弱肉強食優勝劣敗』的道理，我有一次就將這句話請總理寫，總理寫了兩個星期總不願寫，到兩星期以後，他把我叫去，却寫了『天下為公』，交給我之後，也不說什麼，但是幾個月之中，在無形有形之間，總給我許多暗示，要我自己覺悟，後來到了幾個月以後，他才和我講這『天下為公』的道理，并講『大學』和『中庸』的道理，他說我們中國自有很好的倫理哲學和很好的政治哲學，『弱肉強食優勝劣敗』的哲學，乃是現代西方人所崇尚的哲學，弄不好，就是很危險的思想。大學中庸之道，才是中國很好的倫理哲學和很好的政治哲學。我經過了總理的指導，我的思想和信仰，才完全的改變過來。」（總裁言論第一冊卷二全上篇頁二九）

以後，「將我實驗所得，作成一對聯語，請教過總理，那聯語就是這『窮理於事物始生之處，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兩句話。總理當時稱許的話，我可以不必多說，但他就親筆寫了這對聯語送給我，表示他獎勵後進之意。我可以對各位說，這即可以作為我的革命哲學。」（總裁言論第一冊卷二全上篇頁二九）

（北京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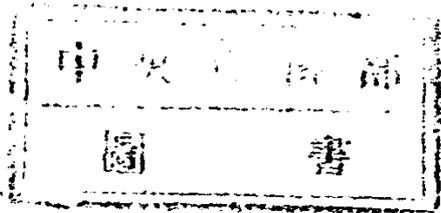
這兩句話是 蔣委員長從前亡命日本的時候，切實研究革命哲學，經過一二年工夫，才歸納出來的結果。

哲學不是什麼深奧不可理解的東西，牠只是一種信仰，人人都有信仰，人人都有哲學。哲學確是大衆的事情，不是哲學家個人的事情，哲學家不過將大衆的信仰加以批評，使之合理化而已。革命者更需要有信仰，有哲學，以爲思想的基礎和行動的指導，否則思想行動必然會錯誤。所以，蔣委員長說：

「革命不是隨便的衝動的事情，一定要有個革命哲學做基礎，革命哲學的基礎也不是隨便看幾本書，研究幾天，便可以得到的。一定要經過許多慎思，明辨，篤行的功夫，才可以構成一個中心的思想。所以我們如要成功一個真正革命家，始終不屈不撓的忠於革命，就要問我們有沒有信仰的中心，就是有沒有革命哲學的基礎。如果沒有，見着講唯物論的人，就跟着唯物論走，見着講唯心論的人，就跟着唯心論走，這種人就不能成爲革命家，而乃是最沒有用最可恥的游移投機份子。所以我們革命黨員最要緊的一個問題，就是要有革命哲學的基礎，」（總裁言論第一冊卷二同上篇頁三二）

蔣委員長的哲學思想的淵源在什麼地方呢？當然是直接師承 總理，而 總理的想

想即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數千年一脈相承的正統思想，這種正統思想由 總理傳諸蔣委員長，經過蔣委員長的發揚光大，於是形成他的偉大的革命哲學。這種正統思想，以蔣委員長所見，就是一種注重力行的思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他們所垂法後世者，完全是一種注重力行的思想。夏禹治水，櫛風沐雨，三



蔣委員長的思想體系

過家門而不入，湯武弔民伐罪，以仁義之師，討暴虐之主，周公治國，夙夜匪懈，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這些都是力行，不是空談。及到孔子，力行的精神，更爲明顯；爲魯司寇，三月而魯大治，不得志於魯，去而周遊列國，求其道之行；返魯講學，誨人不倦，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然而這種正統思想，因爲一誤於漢學，再誤於宋學，遂告中斷。漢學以訓詁考據爲能事，聚精會神於書本字義的解釋，往往詰一義明一字就得寫上數千萬言，你看冤枉不冤枉？由漢而唐，所謂儒者，都是解經之儒，和儒家的正統思想不啻痛癢。宋雖一反漢學，不斤斤於訓詁考據，却空談性、命、理、氣。「紙墨上多一分，便是身世少一分。」「明道不在章句，學不在誦讀。」宋元來儒者，却習婦女德，甚可羞。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爲上品矣。豈若真學一復，且有經濟，使乾坤中永享治安之澤乎！「顏習齋對於漢學宋學的攻讐，甚至爲恰當的。」蔣委員長對於顏習齋，頗有研究，在他手輯的力行叢書中，即有「顏習齋言行錄」，他批評漢學宋學，一如習齋，他說：「一般士大夫不是學漢儒解經，就是學宋儒講性，結果只是空疏迂闊，無補實用。」（總裁言論第一冊卷二同上篇頁二五）不主張讀死書空談理讀書談理，要以力行爲基礎，離開力行，讀書談理都無是處。

指摘漢學宋學的失誤，顏習齋之前，還有王陽明。蔣委員長尊習齋，尤尊陽明，對於陽明學說極爲推重，且有很多發揮。「王陽明哲學是非常之有價值的，他在儒教中間，誠是別開一個生面。他因爲當時中國民族麻木、消沉、散漫、萎靡、只講玄學，玄教，儘是講，而不去行，這實在是亡國滅種的現象。他目觀當時中國人的民族思想那樣衰

弱，精神那條消沉，頹唐，將來一定要崩潰滅亡。他知道當時之所謂儒教，只注重靜的一方面，而不能提倡動的哲學，僅僅向靜的方面發展，大家伏在桌子上翻死書本……；這樣的讀書人，讀了幾句死書，只會空談理學……但他早已看見中國民族將來不得了，一定會給外族來侵略，所以他到後來專提倡動的哲學，而批評靜的哲學」。（總裁言論第一冊卷二）要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免要抵抗日本武士道的精神」頁七四——七五）

接發發揮王陽明的一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道理。他說：「怎末叫一致良知」，那就先要從怎樣叫不致良知講起。現在就「愛國」來說：我們知道一個人都應該愛他的國家，應該為他的國家來犧牲，愛國家，為國家犧牲，都是個人良心上認為應該做的事情，這就是良知。但是有些人知道國家應該愛，而却不能實在去愛，知道應該為國家犧牲，而却不肯去犧牲，這就是不致良知。……我們只要個人照着自己良心所認為應該做的事情去做，則一切不好的動念，如個人的意見，私仇……都可以消除淨盡，這就是致良知。中國能够個個人致良知，就可以消滅日本，拯救中國。」（總裁言論第一冊卷二）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頁二三）

不能致良知，就是不能知行合一。則知即行，知行不能分開。王陽明說：「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說以覺精察，便是實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個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個行；原來只是一個工夫。」「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

是知之成。」「知行原是一事。」「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所謂知行合一，即是致良知。能行致良知，即是知行合一，不能致良知，即是知行不合一。致良知和知行合一是一貫的。」「蔣委員長說：『然而我們中國人今日則腐敗，懶惰，麻木，頹唐，自私自利，怕生怕死，不肯犧牲，不愛國家，不知廉恥，就是不能「致良知」，就是不能「知行合一」。』（總裁言論第一冊卷二）「研究中華民族致弱之由來與日本立國精神之所在」（頁四三）

王陽明提倡知行合一的哲學之後，當時雖能風行一時，但到他死後，雖有他的幾個學生傳受他的學說，可惜他們沒有他這樣大的魄力與精研深造，所以到後來不久，他們的精神仍舊偏陷於靜的方面，而動的方面却完全振奮不起來。及到滿清入關，我們中國民族被滿清統治了二百多年，也就是由於王學未能充份發揮的原故。總理看過王陽明的哲學，認為是中國存亡的大關鍵，但是單靠王陽明的「知行合一」的學說，還不能喚醒我們中國民族的儒教迂腐之氣，所以他講得更加明顯，要我們中國人在行的方面進行，「知難行易」就是獎勵我們中國人極力去做，不要伏在桌上讀死書嚼虛文。「知難行易」的學說，是着重「致良知」的「致」字，和「知行合一」的「行」字，而使之歸結於「力行」，反對「知易行難」的舊說。總彙說：『我一生最大的敵人，無論那一個敵人，我都不怕，因為沒有那個可以做到我的敵人。但我們真的敵人是那一個？就是中國從前的學說。從前的學說是什麼？就是「知易行難」。』因為一個人儘是求知，不肯去做，所以弄得一切事情都腐敗下來，致受外人侵略，亡國幾次，革命不能成功。』

總理比王陽明更進一步提出「知難行易」的真理，成立了一個新中國的民族哲學。這確是空前的發明，偉大的創造。

王陽明「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的哲學，和總理「知難行易」的哲學，是不是有出入呢？對於這一點，蔣委員長解釋得最清楚，他說：「總理發明「知難行易」的原理，完全是要我們注重「行」字，因為總理生在滿清末年，與王陽明生在明季一樣，同是看着中國人中了幾千年來「知易行難」學說的毒。……所以王陽明使用「知行合一」的學說，來醫治當時中國的民族性。而我們總理更進一步用「知難行易」的學說，要來啓發中國的民族精神，並用來實行他的革命主義。總理的意思就是說，你們既知道三民主義和國民革命是好的，那你就只要照我的革命方略去做，照我的三民主義去行，就一定能夠完成革命了。所以總理常講，「你們一般黨員只要照我所講的話，實在去行就好了，不要再求另外的知。」他的意思即是，良知是我們大家所固有的，故不必另外再去求知，若說要來學問而智識完全，就要用許多時間，更是不易。求「知」既是不易，即是很難，後知後覺以及不知不覺的人們，只要跟着先知先覺的人們去行，就可以節省時間，完成革命，因為跟着去「行」是很容易的。照這樣說，王陽明所講「良知」的知，是人的良心上的知覺，不待外求，而總理所講「知難」的知是一切學問的智識，是不易強求，而知識的「知」，不必人人去求，只在人人要「行」，我們理解了這點，便知總理所講的「知難行易」的知，同王陽明所講的「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的知，其為知的本體雖有不同而其作用是使人去行，就是注重行的哲學之意，完全是

一致的。』（總裁言論第一冊卷二「官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頁二五）「知行合一」的「致良知」的學說，是與「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不惟不相反，而且是相輔而行的，亦惟有能致「知難行易」的良知者，才能實現「知難行易」的學說，才可以挽救中國已死的人心。』（總裁言論第一冊卷二同上篇頁二八）「今天所講的「致良知」三個字，是我們現在實行革命主義最緊要的「心法」，不但不與總理的「知難行易」的學說相反，而且這兩個學說是互相闡發，實有相得益彰之效，如果我們僅是講「良知」而不講「致」，那就像宋儒一樣，不免落於空虛，陽明所以要在「良知」上加一個「致」字，就是要從各人良知到事物上去切實體驗，所以「致」就是「行」，致「良知」就是證明「行易」，就是要實實在在去做，這就是大學的道理，也就是「總理「知難行易」的道理。』（總裁言論第一冊卷二同上篇頁二三）

將「知行合一」和「知難行易」打成一片，而認定「行」的注重是二者的共通點，這確是蔣委員長的創見。他更集二說之大成，攝二說之精英，發揮光大，創造出他的力行哲學。自從他以王陽明「知行合一」之動的精神，再加上「總理「知難行易」之行的哲學，融會貫通提出唯行論以後，哲學上一向糾纏不清的唯心和唯物的論爭，便得到了完全的解決。他說：「現在唯物論者僅是講「唯物」，完全排除了精神方面，這在東方民族一定是立不住的，就是西方的民族，也不能離開了精神而獨講物質所能立住的。我們中國從前僅是講唯心，而不注重物質，所以不能夠獨立，不能夠發展。我們要成功一個新時代的國家，精神與物質，決不偏廢的。我們只知道「知難行易」的「行」字，

爲唯一的人生哲學，而不能承認唯物哲學，亦不能承認唯物哲學，而我們只知道有一『行』的哲學。』（總裁言論第一冊卷二）『要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先要抵抗日本武士道的精神』（頁八六）又說：『講良知知果僅是講『良知』而不講『致』，不注重在『致』字，那就是一個唯心論者，亦就與知難行易的學說相反了。如果講『良知』而注重在『致』，論良知而注重實行，那就不能算是唯心論。陽明的學說所以與程朱等講心性者不同，總理的學說所以與陽明的學說作用一致，就是在此。……一個人生在宇宙中間，終日因緣接觸，都離不了事與物，在心與物微妙的關係中間，我承認一切的一切都要從事實上，客觀上來決定。所以我們絕對不是唯心論的，我們也決不承認是一個唯心論者，同時却也不是機械的唯物論者。總之，我們認定凡是從實際上把事業辦成，就要先從事物的方面注意，然後才生效用。不過我們要辦成功一件事情，要整理一種物件，決不能忘却自己的心意，如果離開了意志，是一件事都做不成功。』（總裁言論第一冊卷二）『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頁二九）更說：『總理常講，精神和物質是不能分離的。總理這把精神的意義解釋得很明白，他說凡不是物質的東西，統統叫精神。所以我們要承認宇宙間除了物質之外，還有一個精神的東西存在。承認精神的存在，便承認心意的存在。有心意便有一良知，『不過有一良知，』要能『致』，即是『行』，即所謂實現良知，亦即是『知難行易』的實行者。如此所謂良知，才不致於落空，才不會做一個空疏的唯心論者，同時也不會做一個機械的唯物論者。所以我們對於哲學的態度，不能承認唯物論者，亦不能承認唯心論者，古今來宇宙之間，只有一個『行』字才能創造一

切。所以我們的哲學，唯認知行易爲唯一的人生哲學。簡言之，唯認「行」的哲學爲唯一的人生哲學（總裁言論第二冊卷二全七篇頁三〇）。

「古今來宇宙之間，只有一個『行』字才能創造一切。『行』能創造一切，這是唯行論的根本思想。」

在「行的道理」中，蔣委員長把行的哲學更發揮得盡致。他首先告訴我們爲什麼行的哲學是唯一的人生哲學，因爲「人生自少至老，在宇宙中間沒有一天可脫離『行』的範圍，可以說人是在『行』的中間成長，由『行』的中間而充實了人格，而提高了人格，一切聖賢豪傑革命志士，因爲能有目的有決心的去行，所以能達到他們的志願，完成最高尚的人格。……明白了人生在宇宙間的地位和價值，而行乎其所得不行，這樣，就必然做到至誠專一，態度極自然，而步驟極堅定的地步，一天天的向前進取，這就是中庸所說的「至誠不息，不息則久」。宇宙人類所以能永遠生存，能不階進步，全賴有此」（總裁言論第一冊卷二「行的道理」頁二六一）。

其次，「行」的真義是什麼呢？「動」並不就是「行」而「行」則可包括某種的「動」在內。行是經常的，動是臨時的；行是必然的，動是偶然的；行是自發，動則多半是他發的；行是應乎天理順乎人情的，動是激於外力偶然突發的。所以就本體言，「行」較之於「動」更自然，更平易；發其結果和價值來說，動有善有惡，而行則無不善，行是繼續不斷的，動是隨作隨止的。……或者可以說「動」是低級的，而「行」才是高級的。……所謂行，只是天地間當然之理，是人生本然的天性，也就是我所說的「實行良知」。

「……凡是真正的行，牠必然是有目的，有軌道，有步驟，有系統，而且有一反之於心而安」的目標；牠必然是正軌的，經常的，是周而復始繼續不輟的」。（同上頁二六二—二六四）又說：「行的意義，是不分動靜的。整個的行程中間，工作是行，游息也是行，作事是行，修養也是行。……我們所說的行的哲學，就無分於動靜，在跡象上看，雖然是有動有靜，但在整個過程中，向外表現發展的時候固然是行，生機潛蘊成長的時候也是行，只要是合乎天理，順乎正軌，動亦是行，靜亦是行，宇宙與人生，無時而不在行進之中，我們為改善人生而力行，應該認識行是經常的和恆久的。力行中每一階段，或著，或隱，無一不在行，亦無一刻是真正休止而不行，亦可以說宇宙皆『行』的範圍。」（同上頁二六四—二六五）

其次，行的要素是「智仁勇」而行的原動力是「誠」。「我們要遵循智仁勇三達德來實行我們人生的本務，就元。總理所說的『聰明才力愈大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千萬人之務；聰明才力略小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務；至於無聰明才力者，亦當盡一己之德力服一人之務。』只要我們由力行而增進我們利他的本能，只要我們真純專一永不退轉，那就必能達到我們人生『行』的目的」（同上頁二六八）「誠」又是行的原動力，有了誠，就會做到大公無私。「只是發乎天性，出乎至誠，是利他而不利己，是救人而不是害人，那末所謂『誠者物之終始，』開始的時候已伏有最後成功的因素。所以我們行事，只要以至誠去力行，就必能篤行實行，唯有篤行實行，才能算是行。我們所行的就是在行『仁』，仁者本乎入公出乎至誠，所以知之出乎誠者必智，行之出乎誠者必

勇，智者之知必知仁，勇者之行必行仁。而且其行必篤，其知必致，其知其行，斷無不成。如果人生沒有一「熱誠」之誠，則智仁勇三達德，也無從發生，無從表現。」（同上頁二六九、二七〇）

最後行的目的是為人類為民族。「人之生也，是為「行」而生，那末，我們的「行」也應當為生而「行」，我們生而有這良知良能，一般自幼到老，孜孜兀兀，小一些說無非滿足自己生存的慾望，充實自身生活的內容，推而廣之，就是要為家族，為鄉里，為社會，為國家，為全人類有所表現或貢獻。因之，我們可以明瞭，所謂「生」就是為人類生活，羣衆生命，民族生存，國家生計而「生」；所謂「行」也應當為人類生活，羣衆生命，民族生存，國家生計而「行」。」（同上頁二六六）

把上述兩端納起來，「力行」就是革命。「須知革命的動機是救人，就是利他而不是利己；革命的本務是「行仁」，就是愛人而不是害人。……我們國民革命的宗旨，就是要打破個人利己主義，而要救取痛苦的人民，最危急的國家，就是以利他為目的。……確定了思想，認清了方向，就我們的本性，發揮我們的良知良能，決心力行，坦白勇敢，一往向前，充其行之極致，就是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亦是甘之如飴，無所畏懼。古人所謂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這是我們力行的本義。這樣力行，就是革命，亦唯有真正革命的行為，方據表現力行的意義。這就是我們革命者為實行三民主義救國救世惟一的精粹！」（同上頁二六七、二七一）

「行」有「行」的法則，在「行的道理」（總裁言論第一冊卷二頁二七二、二七三、二七四）

中，蔣委員長指示我們要應用科學的方法，遵循「行」的法則，注重「行」的四大要件：

(一) 必須有起點——在規定計劃之始，要找到從何處着手，是最自然最便捷最容易收效。登高自卑，行遠自邇，就是起點的一種。如果只知好高騖遠，或忽近圖遠，或想投機取巧，單從中途截取一段，越級開始，而不從基層工作着手做起，這是不可能有成就的。

(二) 必須有順序——在未行之始，必須確立計劃，規定順序，一切要有預備，要有估計，而且所定的計劃，更必須注重時間與空間，確定其數目和質量。有了順序和步驟，就不致先後倒置，凌亂失次，緩其所急，急其所緩。

(三) 必須有目的——必須有正大光明的目標，目標確定了，朝着這個方向，灼然不惑的向前做去，不達目的決不中止。

(四) 必須是經常的——經常的恆久的行，是始終無間斷貫徹到底的，革命的力量是日積月累自強不息的。革命建國是堂堂正正的大道，決不是什麼出奇取巧的舉動，也用不着別出心裁的方法，更不可有投機取巧害人利己的私圖。

在「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裏（總裁言論第一冊卷二頁一五六—一七八）更進一步的予以闡明：

(一) 科學的辦事順序：由近而遠，自卑而高，為大於微，圖難於易。——要做遠大高尚的事業，一定先要從最切近最不易最細微的事情做起，按部就班的逐漸擴大增長

。小的事情先做好，然後可以做大事；普通日常的事物先能處理得當，然後可以做特殊高尚的工作；容易辦的事情先能一件一件做到，然後可以成非常的功業。不要好高騖遠，希圖躐等僥倖。

(二)科學的辦事精神：實事求是，精益求精，繼續不斷，貫徹始終。——對於任何一件事物，不明白當然要研究明白，已明白還要澈底明白；未做好當然要做得更好，既做好還要做得更好。總要天天有進步，天天有新的道理和新的東西發明出來。要發揮這種「實事求是精益求精」的精神，就要有恆心有毅力，凡事能夠本着「繼續不斷貫徹始終」的精神奮鬥到底。

(三)科學的辦事方法：

第一，範圍與組織。科學的辦事方法，第一件要緊的事情，就是先要認清我們所辦的事業之範圍，換言之，就是要確定我們工作的對象與目標之所在。我們所要研究或處理的一切事物之範圍與工作的對象愈明確愈狹小，便愈容易找到我們工作的重心。範圍確定了之後，我們就要根據事業的範圍和工作的對象，來建立一個最合理最有效的組織。一切合理的科學的組織，必須具備兩個基本要件：一個就是要有最明確之直的系统，一個就是要有最密切之橫的連繫。所謂直的系统，即指出上而下層層節制的統屬關係，必須此種關係明確，然後組織才能運用靈活，有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所謂橫的連繫，即指整個組織之各部分，彼此休戚相關，動作協調的連帶關係，必須此種關係密切，然後組織的各部分，才能調整而互助合作，使整個組織發生最大的效能。一個組織所具備

之直的系统與橫的連繫愈加明確密切，則愈堅固靈活，愈合理有效，亦即愈為有機體化之科學的組織。

第二、立案與預備，在有了科學的組織，並認明了事業的範圍之後，與開始工作之前，有一種最要緊的科學的辦事程序，就是立案與預備。立案就是對於我們自己所要做的事業，預先搜集各種材料，加以精到的研究，再假設在以後事業進行中種種可能的情況，發揮我們的聰明才智，以最縝密的思慮分別擬定不同的方案，預先準備着，到以後進行我們的工作時，遇着那種情況發生，我們便可以立刻拿出預先所準備的最適宜的一種方案來實施。立案就是我們辦事最要緊的一種預備工作。

第三、分工與合作。人類文明的進步，完全歸功於分工合作。無論學問與事業，必須分工始能專精，必須合作始能成功。

第四、研究與實驗。宇宙一切事物，一定有牠的道理之所在，我們必須將道理研究明白，然後可以解決各種問題，而成就我們的學問和事業。學問和事業的進展，是由研究而來。經過研究之後，最要緊的事情，就是實驗，因為研究所得的往往還是空洞的理論，必須經過實驗，然後可以證實，才可以判定研究所得的理論是否正確，是否適合實際的環境。

第五，分析與統計。凡是一個計劃或一種事業，在實驗的時候，一定發生許多現象，或是好的或是壞的，或是成功的或是失敗的，我們應當就這一羣的現象，加一番分析與統計的功夫，以發現我們的缺點在那裏，優點在那裏，而判斷我們的計劃之正確性和

事業的進展達到什末程度，以及將來應該取什末方針，走什末途徑。

第六，改進與發明。分析研究一切事務，最緊要的就是要能發現所有的弊病，弊病既經發現之後，隨即就要加以改進。此外，更要在積極方面能够本着精益求精的精神，努力發明新的道理，新的方法，和新的東西來求一切事業的進步。

蔣委員長的革命哲學的骨幹，就是唯行論。對於宇宙和人生的說明，都是從這基礎出發的。

一一 宇宙觀

宇宙是在不斷地運行的，因為不斷的運行，才有不斷的進化。「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宇宙間最顯著的現象」也就是宇宙萬象所由構成的，無過於天體的運行。「易經」上的註文說：「天行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非至健者不能，君子法之，以自強而不息。」天體經常不變的運動，我們自強不息地在其中去力行，宇宙由是而不斷進化。所以蔣委員長說：「吾人取法於天體之運行，就自然奮發興起，勉勉不輟……」。「天天的向前進取……」。「宇宙人類所以能永遠生存，能不斷進步，全賴有此。」（總裁言論第一冊卷二「行時道理」頁二六二）

整個宇宙都是我們「行」的範圍，宇宙和人生無時不在行進之中。要宇宙有進步，我們必須不間斷的去行，冒萬難的去行，不達目的不止，生活一天，力行一天，循着自然的道理和人生的本務，禔頭做去。如果一曝十寒，遇到困難就灰心退縮，事業是永遠

不會做成功的，宇宙也永遠不會有進步的。蔣委員長說：「構在我們人生途中的，並有很多的危險和無數荆棘與障礙。我們力行革命，具有許多地方必須冒險的，而且要決必犧牲的。但是古今來鑿山治水的巨大工程，騰穴鑿地的偉大發明，旌旗轉地薄弱扶傾的革命工作，都是我們人類力行所成就，所以問題完全在我們有沒有貫徹始終的決心和自強不息的精神。如果有此種精神，那末、無論遇到什麼危險，就能一處危若安」，「履險如夷」。凡是常人所視為困難危險的事，真正的革命黨員，就以爲是平常之事，這就因爲他有「行」的精神，這個「行」的精神就是革命的精神。只要是他分內之事，只要是他主義信仰和職責所在，就是到了顛沛流離，乃至赴湯蹈火的時候，亦能泰然自如，無所謂難，更無所謂畏，這樣的去行，還有什麼不容易呢？」（全上頁二六八—九）

宇宙人類能夠永久生存，能夠不斷進步，完全在乎一個「行」字。這「行」是建設的，上面已經說過，「行」的目的是在增進人類生活，羣衆生命，民族生存，和國民生計；總之，是要促成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和進化，「行」是至善，是建設，而非亂動盲動和破壞。

「行」的本質是至善，是建設，至善和建設是爲了生存，宇宙人類要生存，就必須力行，力行才會進化。「古今人類的努力，都是求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人類求解決生存問題，才是社會進化的定律，才是歷史的重心。」（總理語）從這裏可以看出社會進化的原則。馬克斯以爲社會進化是由於階級鬥爭，由於經濟利益的衝突，要使社會進化，必須促成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社會進化的原則。總理則在「民生主義」第一講中

、批評馬克斯說：

「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有衝突。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就是為大多數謀利益，大多數有利益，社會才有進步。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之所以要調和的原因，就是因為要解決人類的生存問題。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為要求生存，人類因為要生存，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所以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這種病症的原因，是人類不能生存，因為人類不能生存，所以這種病症的結果，便起戰爭。馬克斯研究社會問題所有的心得，只見得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得社會進化的原理，所以馬克斯只可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家」，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理家」。」

蔣委員長完全接受了總理的解釋，他說：「總理是社會國家的生理學家，應用生理學的道理，根據社會進化的原則，來救社會國家，所以一切的方法是仁愛的積極的而適合於社會國家之生存發展的。馬克斯則僅為社會的病理學家，只見得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得社會進化的生理，所以他定的一切方法，是殘忍的，是消極的，只有阻礙社會的進化，甚至破壞社會的生存」。《總裁言論第一冊卷一「總理遺教六講」頁三〇五。

宇宙人類的進化，是由於求生存，要求生存便不能衝突，鬥爭，和搶奪，而必須要

互助，調和，勞動，和服務。所以蔣委員長說：

「我們革命的目的在救國救民，因此我們革命的人生，就是勞動服務的人生，人人要以勞動爲本分，以服務爲目的。尤必基於爲社會國家服務之觀念而勞動，盡我們的力量，來挽救國家的危難，造成新的社會，建立新的國家，解除同胞的痛苦，而增進其幸福。……更要造成勞動服務的風氣，要訓練幾百萬乃至幾千萬的部下和民衆，都養成勞動的習慣和服務的精神，共同担負社會國家各種建設事業的責任。……看見人家有痛苦有患難，或者做事有能力不及的地方，都要盡自己的能力去幫助他們，不好坐視不救，見義不爲。曾文正公說，「扶危救難之英雄，以心力勞苦爲第一義。」現在我們國家如此危辱，人民如此困苦，我們要做救國救民的革命事業，更非勞必勞力不爲功。……人類文明的進步，完全歸功於勞動。天下事物，唯有勞動，然後可以發明，可以創造，所以勞動是一件最神聖的事情。」（總裁言論第一冊卷二「應如何達到革命目的」頁一八四——一六）

又說：「我們人類社會生活最基本的條件，在於互助，要使人類社會生活臻於美滿完善，必須充分發揮人類互助的精神。互助的精神愈能發揮，人類社會生活的幸福就愈能增進，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們現在革命救國，就是要盡我們所有的能力，來打破人類社會生活幸福的障礙，進而創造人類社會生活的最大幸福。尤其是現在我們中國因爲受了外國帝國主義者強烈的壓迫，國內土匪殘暴蹂躪，致使一般人民幾無生活幸福之可言，我們格外要發揮「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救人救世的精神，犧牲個人

一切安樂，冒一切艱苦，來為國家社會服務，使一般痛苦的同胞出水火而登諸衽席之上，享受人生最大幸福，才算完成我們革命軍人救國救民之責任。……總理教訓我們說：『人生以服務為目的，不當以索取為目的，聰明才力愈大的人，當盡其能力而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力略小的人，當盡其能力以服千百人之務，造千百人之福。』這就是我們革命軍人最要緊的修養。』（同上頁一八六下）

人類只有站在互助服務的觀點去力行，才能不間斷的生存，人類能不間斷的生存下去，宇宙才能不停止的進化起來。宇宙是力行和生存的範圍，而非暴動和鬥爭的場所。『民生問題就是生存問題……民生是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是歷史的重心，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總理語。馬克斯的錯誤就在這裏，他錯誤物質是歷史的重心，因此主張用階級鬥爭的方法來拯救，以促成社會的進化，產生了他的唯物史觀的學說。其實宇宙並非完全是物質的世界，牠同時也是精神的世界。這兩者不是絕對對立的，而是相輔為用的，牠是『行』的兩面。蔣委員長說古今來宇宙之間，只有一個『行』字才能創造一切。『行』包含勞心和勞力兩方面，這箇『行』就可以創造一切的精神和物質，也可以運用一切的精神和物質，來為人類謀幸福，為世界求進步。

『總括宇宙現象』，要不外物質精神二者。精神雖為物質之對，然實相輔為用也。考以前科學未發達時代，往往以精神與物質為絕對分離，而不知二者本合為一。在中國學者，亦恆言有體有用。何謂體？即物質；何謂用？即精神。譬如人之一身，五官百骸，皆為體，屬於物質；其能言語動作，即為用，由人之精神為之；二者相輔，不可分

離。若猝然喪失精神，官骸雖具，不能言語，不能動作，用既失，而體亦即成爲死物矣。

這是總理對於宇宙現象的分析，關於精神和物質的考察，是極正確恰當的。蔣委員根據總理的哲學，對於精神和物質也有如次的論述：

「一個大生在宇宙中間，終日因緣接觸，都離不了事與物。在心與物微妙的關係中，我承認一切的一切都要從事實上客觀上來決定，所以我們絕對不是講唯心論的。我們也決不承認是一個唯心論者，同時却也不是機械的唯物論者。……不過我們要辦成功一件事物，要整理一種物件，決不能忘却自己的心意，如果離開了意志，是一件事都做不成的。……所以我們要承認宇宙間除了物質之外，還有一個精神的東西存在。……所以我們對於哲學的態度，不能承認唯物論者，亦不能承認唯心論者，古今來宇宙之間，只有一個「行」字才能創造一切。」（總裁言論第一冊卷二「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頁二九—三。）

「我們要澈底研究 總理的遺教，一定要從根本上先懂得 總理的哲學。 總理的哲學，就是民生哲學。 總理主義的思想系統，是以民生爲指歸。……以民生爲中心來解決一切問題，所謂「民生爲歷史的中心，」就是全部三民主義最基本的原理。」（總裁言論第一冊卷一「總理遺教六講」頁二〇一、二〇四）

蔣委員長根據 總理的這種民生哲學，來觀察宇宙的進化，分析精神和物質的關係，而提出一個「行」字，可以說完全是唯行史觀的。

三 人生觀

蔣委員長的人生觀，可以由他的兩句名言完全代表出來，那兩句名言就是：

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

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

什麼是人生？分析言之，人生就是生命和生活。什麼又是生命呢？生命的要素如何？生命以時間空間為條件；生命的構成是以物理化學的原素——原子、電子、質子等成分為物質基礎的，生命有生物特有的機能——生長機能、生殖機能、和適應環境的機能。這些都是生命的要素，但是這些還不能說明人類的生命。人類生命，除時間空間物理化學原素和生物特有的機能之外，還有自覺——人類能夠自知其為人類的自覺，人類和禽獸的分別，即在人類有自覺，而禽獸沒有自覺。這樣，是不是就已經認識生命了呢？蔣委員長認為還不夠，人類生命還有更重要的原素，這原素不是自覺而是民族性。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民族生命中的一份子。講生命當講民族的生命，離開民族的生命，就沒有個人的生命。他說：

「我們每一個人自從天地父母生我們下來，撫育我，鞠育我，長大以後，進到學校裏或部隊裏，由先生或上官教育我，培植我，使我成一個大人，有相當的知識和能力。但是我們這個軀體，普通最多只能活到八十歲，這八十年的壽命，若計算起來，並沒有多少時間。一年不過三百六十五天，八十年合計也不過二萬九千二百日。這個短短的時間

很快就過去了，若拿我們自己這八十年的壽命，來和我們民族五千年有記載的歷史來比，那不是僅僅佔到極短極短的一段嗎？而我自己一個人，在整個偉大的民族生命中，豈不是更渺小如滄海之一粟嗎？同時，我們這個生命乃是整個民族幾千年所遺留下來的，乃是整個民族的生命一份子，乃是要開拓整個民族未來無窮的生命向。所以我們講生命，決不能就自己這個極小的軀殼之存亡來講，決不能就自己這個極短的壽命之始終來講，我們要講生命，一定要講整個中華民族的生命，要講我們民族整個歷史的生命。總之，我們不好把自己個人的生存看作是生命，我們要把整個民族之歷史生命當作自己的生命。所以我們對於整個民族，整個歷史，要負起承前啓後繼往開來的大責任，這就是講我們要繼續保持整個民族的生命與歷史的光榮，更要努力將這個生命與光榮發揚光大而開拓於無窮。」（見「消滅赤匪與完成革命」頁一六一七）

這是說明生命要素的極透澈的確論。人是有民族性的，他是整個民族的一份子；生命也是有民族性的，他也是整個民族生命的一份子。人不能孤立，離開他人而獨立；生命也不能單獨，離開他一生命而獨存。人是合羣的，生命是全體的。人和人相遇，生命和生命相接觸，不能不互相影響，互相滲透，互相結合。我們自初生以至長成，個人生命遂漸為民族生命所注入，所充滿，所同化，所統一。我們的血統，我們的思想，習慣語言，風俗，那一樣不是民族生命之所有？不講民族生命，那裏有個人生命？只有在民族生命中，才能找得着個人生命，民族生存，個人才能生存；民族生命存在，個人生命才能存在，攻擊民族，就是破壞自身；破壞民族生命，就是破壞自身生命。

說

說明了生命以後，接着就得說明生命的意義。生命的意義在什麼地方呢？蔣委員長

「我們的生命究竟是什麼東西呢？在此說明生命意義之先，有一句要緊話請各位聽着，就是我們軍人的職分，只有生死的「死」字，我們軍人的目的也只有「死」字，除了「死」字之外，反面說，就是偷生怕死。如果偷生怕死，不單是不能做軍人，而且是沒有人格，就不能算是人。古人說：「與其背義而生，則生不如死。」這句話，是為一般人類說的。一般人類尚應如此，何況我們軍人呢？你們要曉得我們的生命，不是一時的，是永久的。我們的生命不是我們自家生出來的，是我們父母推而至數千年祖宗生下來的。我們的生命不是只在我身之後就斷絕了的，是我們子孫孫會繼承下去的。所以我們現在的生命是有限的，我們真正的生命是在死後的將來，千千萬萬年之中的。我們的生命能得將來世世承受的價值，那末暫時肉體的死活，就不去計較牠了。所以古人說：「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如果我們的死有如泰山的價值，死得其所，如為主義而死，為救國救黨而死，那末死又有何足惜；因為我們身死之後，還有繼續的人來繼承我們的事業，亦就是繼續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生命就永久不會斷絕的了。所以我們的生命意義是創造將來繼續之生命，不是單求肉體上一時之存在，就可以算長命了。」（見「本校之使命與革命的人生」——十三年五月八日在黃埔軍校講）

生命的意義是在如何使生命發揚光大，如何使生命永遠繼續，如何使宇宙有繼起的

生命來承接我們的生命。肉體的死亡不能斷絕我們的生命，生命的斷絕在於沒有繼起的生命。所以死是不足怕的，可怕的是繼起的生命能否創造，只有整個民族生命的發揚，才是我們生命的發揚；只有整個民族生命的繼續，才是我們生命的繼續。民族是大我，個人是小我；大我生存，小我不死，也就是民族生存，個人不死，否則民族死亡，個人沒有不死亡的，如有不死亡的那便是奴隸了。爲了民族生存，有犧牲個人生命的必要，所謂犧牲小我完成大我，所以蔣委員長說：

「我們一個人的生命，溯不窮流是整個民族生命延續中之一份，同時又是整個民族生命繼續開展的一點，因此可以說我們的生命向上推溯，就是敬仰祖宗的生命；往下推演，就是未來無窮子孫的生命，所以我們的生命乃是整個民族生命長流中之一點，只要這個偉大的民族生命長流不滅，我們的生命便是永久不死，因此我們決不能說我們的軀殼存在，便有生命，軀殼一旦死亡，便沒有生命了。」（見軍人應確立革命的人生觀）
廿三年九月廿四日在軍官團講

更說：「隨便那一個人，活到一百歲也是要死的，早一點死，遲一點死，都沒有什麼關係，不過死了之後，我們的歷史生命要能繼續下去才好，決不是我們的身體死了，生命就完了，我們生命的意義不是那樣的，比如我們總理逝世到今年已六年了，但是我們總理的生命沒有完，且永遠是可以遺傳下去的，我們一校的學生已死了幾千人了，但是軍校學生已死的生命並沒有斷絕，因爲中國國民黨存在，國民政府存在，軍官學校存在，軍官學校的學生也還有存在，他們的精神永遠不會消滅，大家不要以爲我們個人既

然死了，生命即告斷絕，其實並不是那麼一回事。比方我們總理死了，有我們一般學生來繼續 總理的生命。我們一般同學死了，從新又有一般同學與同志來繼續我們的壽命，因為我們生命的意義，是在創造其繼續的生命，不是說我們出生到死為止就算了，我們的生命自己天天在創造的。生命是可以創造的，不是生死可以限制的。限制却在於我們自己。如果只圖自私自利，那生命到死便是完了，若是實行三民主義，想民族獨立，謀黨務發展，我們的生命就是永遠不會斷絕的。」（同上）

蔣委員長把生命和生命的意義加以澈底研究以後，才歸納出這一句話：「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

其次，什末是生活呢？生活是生命的活動。從初生到老死，這一段距離開依種種生命活動，都是生活。生活是介乎生與死之間的人類活動。生命的所在，就是生活的所在。蔣委員長說：「所謂人生最緊要的，就是生字，這個生字，含有二個意義：一曰生活，一曰生命。我們一天到晚，無論飲食起居睡眠辦公出操……都不出乎生活的範圍。」

（總裁言論第一冊卷二「黨員的人生觀」頁四）

生命不能孤立，生活也不能孤立；生命有牠的民族性，生活也有牠的社會性。講生命當講民族的生命，講生活也當講社會生活。我們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生活，不能隔離社會而孤獨，生活是由社會上人與人間的互助合作而構成的，魯濱遜漂流孤島的生活畢竟只是一個空想的故事。所以西哲亞里士多德說：「人之不能生活於社會，或可以自給而不需要社會者，非為一禽獸，即為一神仙。」蔣委員長也說：「若是一個人不曉得團

體生活的必需，不能與社會來分工合作，做社會團體的生活，是決不能存在的。比方我們不能與農夫合作，那我們就沒有飯吃；又如我們不能與伙夫合作，那我們就沒有飯吃。這是很普通的一個例。」（見「刻苦耐勞與慷慨犧牲之必要」——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在黃埔軍校講）

生活是社會的生活團體的生活，同時還要是平等的生活，勞動的生活。蔣委員長說：「我們要曉得人類的生活，並不能分別高低的。我是一個人，別人也是一個人，爲何有要他做我不屑做的事呢？難道世界上，只有我是人別人就不是人嗎？」（見「本校教育方針與軍人生活」——十三年五月十一日在黃埔軍校講）又嘗說一個人生下來以後，總要吃飯的，不過不勞動，不作生產的生活，而單作一種消費的生活，就人道講起來，差不多已經失了做人的意義了。要曉得米飯是從勞動得來的，如果不勞動而有飯吃，那是天理人情所不容的。

認識了生活以後，再進一步認識生活的目的。生命的意義既是在擴大并繼續民族的生命，生活的目的也必是爲了社會人類的生活，是正大光明的，不是不正當的，私自自利的。蔣委員長嘗說一個人一生所做的事情，就是生活的全部活動。但是我們的生活，要怎樣才是正當的呢？有許多不正當的活動也可以算做生活，嫖賭也可以算做生活，因爲它也是一天到晚在那邊做的，不過有正當的不正當的分別。做壞的事情便是不正當的生活，比如想升官想發財的人，只做自己個人私自自利的事情，不管國家與人民的的事，就是不正當的生活。

不正當的生活、自私自利的生活，不是生活的目的。正當的生活是利他的，所以蔣委員長說：「各位要明白我們生活的目的，不是要我們個人來求生活的，如果我們爲個人來求生活的時候，我們不必到學校裏來了，不必入國民黨了，更不必帶軍隊了，隨便到什麼地方求個人生活是很便當的，但是我們要知道我們的身體父母生下來，在世界中間，是一個人類；在人類中間是一個人。我們應該互相親愛，互相扶助，不僅是要我一個人的生活良好，還要使我們全體人類的生活通通能夠進步，個個人都有良好的生活，這樣子才可以算是真正生活的目的，所以我們生活的目的不是要求我們個人的生活舒適，就算完了，小的，譬如我們在家裏看見父母妻子兄弟他們凍餓的情形，我們如果僅是求個人不凍不餓，這個行不行呢？當然是不行的，至少要我們的一家生活良好，我們的生活方可以算是良好。大的，譬如我們在學校裏頭或是團體裏頭，不能我一個人良好，其餘都不好。所以我們要求全體人員的生活良好，要羣策羣力，同心同德來分工合作，使我們個個人受良好的生活。現在我們革命是爲甚末？如果爲我們個人求我們個人生活滿足，那我們也不用來革命了，就是給人家做工，都可以過去，爲什麼要來革命呢？我們要革命，非是爲我們個人而革命的，擴大些講，是爲我們一個團體要求良好生活，要達到民權的生活；再大些講，就是要爲我們全國的同胞來求幸福，使他們亦是同我們一個樣子的生活，並且比我們還要良好的生活，我們心裏才過得去。再推廣些講，我們全世界的人類都要有一個平等的生活，這才可以算是生活的目的。所以我們的生活不是爲一個人的，我們的革命不是爲我們一個人的，完全是爲全國的同胞全體的人類來革命的

。非革命，全國的同胞不能夠解放，不能夠得到良好的生活。非革命，世界的人類不能夠有平等。所以現在要問我們的生活是什麼？我們的生活就是革命的生活。革命的生活不是爲個人，是爲全體人類來革命的，所以我們毫不怕苦，不怕凍，不怕餓，犧牲我們個人的幸福生命來求全體人類的幸福，這樣子就是我們生活的目的，我們生活的真正目的。』（同上）

他更明白的說：「生活的目的究竟怎樣呢？爲個人的升官發財嗎？想做英雄好漢嗎？若以此爲目的，那就不要來革命了，還講什麼生活目的呢？我要問我們是不其人，人是不是成類的？一個人生在人類中間，如果只管自己有得吃，有得穿，有得住，有得用，不管其餘我以外的幾千萬萬人，究竟有沒有吃穿住用，這樣儘管你自己有得吃穿住用，終竟是不成的。那末，生活的目的究竟怎樣呢？只有一句話，就是「增進我們人類全體的生活，」這才是真正生活的目的。我們革命不是爲個人，乃爲增進人類全體之幸福。所以生活的真正目的，可以說不是爲個人求自由平等和幸福，並且要犧牲個人的自由平等和幸福，以求人類全體之自由平等和幸福。』（總裁言論第一冊卷二「黨員的人生觀」頁四——五）

蔣委員長這樣認識了生活和生活的目的，於是歸納出一句話來：「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的生活」。

我們明白了人生即是生命和生活，又明白了生命的意義和生活的目的，那末，革命的人生觀就是要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和增進人類全體的生活。這種革命的人生觀是：

積極的而非消極的——積極的創造生命，積極的增進生活。

樂觀的而非悲觀的——認生命為有意義，認生活為有目的。

利他的而非自私的——謀民族生命的繼續而非個人生命的繼續，謀人類生活的增進而非個人生活的增進。

力行的而非空談的——非力行不足以言創造生命，非力行不足以言增進生活。

這種人生觀，是每一個革命者所應具備的，所以蔣委員長說：「你們如果要革命，無論遇到什麼危險，失敗，困難，疑惑，毀謗的時候，要都不致於動搖的話，那就要確定你們革命的人生觀。如果要確定革命的人生觀，就先要有革命哲學來做基礎，有革命哲學的基礎，才能心意安定，臨難不苟，至死不變的來革命。」（總裁言論第一冊卷二）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頁三二）

第二章 倫理思想

一 大學中庸

「大學」「中庸」是中國的政治哲學，也是中國的倫理哲學。中國的政治哲學和倫理哲學是相合一的，政治的基礎建築在倫理上面，要治國平天下，必須從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做起。所以蔣委員長說：「倫」就是「類」，「理」是紋理，引伸為一切有條貫有脈絡可尋的條理，是說明人對人的關係，這中間包括分子對羣體的關係，

分子與分子間相互的關係，亦即是人對於家庭，鄰里，社會，國家和世界人類應該怎樣，闡明他各種關係上正當的態度，訴之於人的理性而定出行為的標準。倫理與法制不同，就是倫理是從人類本性上啟發人的自覺的，法制是代表着國家公共權力而帶着強制性的，倫理不僅是指明某種行為是正當的，而且從人生意義上去探求爲什麼這種行為是正當的，法制只是行為的正當與不正當，不容許人們逃避其所當爲，或爲其所不當爲而已。所以倫理的教條比較法制更積極，更自然，亦更能深入於人心。在中國政治哲學上，很明顯可以看出大部分就是倫理哲學，從一個人的修身推到親親，再從親親而推到陳淵任郎，推到仁民愛物，甚至一切的制度和組織也染上不少的倫理色彩，這是中國政治哲學的特點。」（總裁言論第一冊卷二「政治的道理」頁二九八）

蔣委員長講：「大學」一「中庸」，很着重於倫理的一方面，我們研究蔣委員長的倫理思想，首先就應從他的關於「大學」一「中庸」的講解研究起。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這是「大學」的三大綱領，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大學」的八項條目。由內在德智的修養，到外在事業的完成，這種修己治世的道理，完全是一貫不斷進取開展的，本末兼備體用合一的。我請看蔣委員長是怎樣的闡明這三篇八目，他說：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德就是「一個人人生下來賦有的德性，明明德」就是不要使這生下的道德性泯沒，而自己要知道去淬礪牠，光大牠，可以說就是要確定我們的人生觀。至於「存親民」，可以說就是要喚起民衆，復興民族，使民衆的生活能夠向上。」

，民族地位能夠平等。「在止於至善」，這句話的意思是一切行為都一定要到最好的極點為止，即是要達到善的極端，才止於至善。再切近些說，我們一個人生在宇宙，最多活不到一百年，人本是一個爭生存的動物，但因為人類進化，生來就有一種向上的衝動，利他的衝動，這一點向上利他的衝動，存之於心便是「德」，施之於物便是「善」，故「德」貴自覺，而「善」貴及人，自覺就是一明德」，及人就是「至善」。所以一個人有利他的傾向，便能由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愛物。凡是一個人愛父母兄弟，愛人類，愛社會，愛國家，愛民族，都是一點利他性的擴大，不過人類每每蔽於私慾，泯其天性，所以要「明明德」，要「親民」，要「止於至善」。就是說，一個人雖然能自覺，能自強，能親親，仁民，愛物，但是還要不息，不息就是不做到最善的地方不止，即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之意，這就是所謂大學之道。現在再講「知止」的效用，並把他譬喻解釋到我們講的主義上來，這「知止」的「止」字，「止」就是止於至善。比方我們曉得三民主義是我們中國唯一的救國主義，是最好最善的一個主義，我們就應該把其他一切思想行動統統集中在這三民主義上來，止在這主義上，無論其他什末主義什末學說，統統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我們知道三民主義是各種主義中最好的，我們便信仰牠，這就是「知止」，就是「止於至善」；既信仰了，我們有了確信，無論什末學說主義都不能動搖，這就是「定」，所以說「知止而後有定」。信仰既定，從此心安理得，所以說「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必須心安之後，然後能夠放慮，想出種種的方法，所以說「安而後能慮」。把事情放慮妥當，設計周詳，自然能夠實行得到，自然

能够成功革命，所以說「慮而後能得」。『總裁言論第一冊卷二』「革命哲學的重要」頁五六——七。

這一段話是解釋「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的道德，和「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的效用的。大學之道，就體的方面說，是從「明明德」做起，其次在「親民」，而以「至善」為止。就用的方面說，是從「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做起，其次在「修身」，「齊家」，而以「治國」，「平天下」為歸。我們再看蔣委員長是怎樣的闡明這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的道理。他說：

『我們要實現三民主義在今日的世界上，就一定要從先治其國入手，國家治好，然後才講到世界，所以 總理說：「我們要發達世界主義，先要民族主義鞏固才行；如果民族主義不能鞏固，世界主義也就不能發達。」就是這個道理。所以要想治國，就是先要治家，「家」不僅是說一個狹義的家庭，以社會組織來說，凡是一個團體一個學校，一個機關，統統可以作一個大的家庭看。一定要使得這些「國」以下的組織——家庭，團體，學校，各機關皆能整齊，能够一致，「家」齊了，這才能够講治國。這一個齊家的「家」字從前有許多解釋，就我簡單的解釋來說「齊」就是「整齊」之「齊」，所謂整齊者就是不要散漫零亂，無論對什末人對什末事，統統要整齊劃一，要這樣，才能够說是齊家，所以說「欲治其國者，先齊家。」而齊家又一定先要修身，修身就是要使本身端正，一個人的身如不能修，就不能端正，那無論講什末話，做什末事，一定不能使人信服。所以己立

立人，你要立人，一定要你自己先立得穩定，譬如我們教學生，教部下，當教官官長的必須持身端正，才能够指揮一般部屬，修身又先要「正心」，正心就是不要有壞的心思，如果我們心不能正，到處只是想利己害人，就什麼事情都辦不成。我們中國革命不能成功，無論在學校，在軍隊，在機關一切的事情辦不好，是什麼道理？就是負責任的人自己心沒有正，要正心，就完全要把自私自利的醜惡觀念根本剷除，完全以國家民族做前提，這樣心才可以正，才可以正己正人。「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要正我們的心，那就先要誠我們的意，所謂誠心誠意，就是沒有一點虛偽欺詐的意思，我們無論對黨，對國，對朋友，對同志，對人類，應事接物，都要有誠意，所謂「不誠無物」者是也，所以有誠意才可做事，才可以革命。「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這「知」不僅是指內在的「良知」之「知」，而是包括一切的知識，照現話說，這是一切科學知識之知，凡是平天下，治國，齊家，修身，正心，誠意都是知，都是致知，「知」要怎樣「致」呢？「致」就是研究，就是實行，就是說要實現他的所知，這就叫做致知。怎樣叫格物呢？就現在的話來講，「格」就是「分析」，「物」就是「事物」，「格物」就是分析事物之理。我們在一心一與一物」接觸的過程中，要用我們的知識把這物理一件一件分析起來。比如你問為什麼要革命？我們就要分析所以要革命的內容，就是因為國家危急，民族衰弱，不革命就要滅亡，還要進一步去研究，我們國家為什麼落到這樣的原因？我們民族為什麼衰弱到這樣地步？這個衰弱的病源又在那裏？我們就把這個毛病一層一層分析出來，便知道由於整個的民族性的喪失，民族性的喪失又是由於民族精神的墮落，民族精神的墮落又

是由於構成民族份子的國民腐敗，懶惰，苟且偷安，自私自利，不肯努力；這毛病的根源尋着了，又再進一步去研究，怎樣才可以完成革命？就是要實行三民主義。這樣一層一層的分析，這分析就是「格物」，所以說「致知在格物。」（同上頁六—四）

「物格而後知致，知致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這完全是中國一個有統系的倫理的道理。

以上是關於「大學」的闡釋，多末透澈，多末切合實際。下面再來研究「中庸」。程子說：「大學者，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朱子說：「中庸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筆之書，以授孟子。」~~程子~~委員長看來，「大學」是方法論，「中庸」是本體論，這樣把「大學」和「中庸」二書互相闡明，互相貫通，確是有精到的地方。朱子在「中庸」序文中說：「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這是全書的大意要旨，蔣委員長這樣對我們解釋着：

「所謂『不偏之謂中』，就是說『中』有一定的方面和位置，譬如一個圓形或三角形，其中心必只有一點而不能有二點，『中』就是不偏於高，不偏於下，不偏於右，不偏於左；『所以說是一中者天下之正道。』所謂『不易之謂庸』，『庸』本來就是至平至正，日常所見，日常所行而不變易的意思。……一個人見了不是自己本分應得的事物就不要妄取，見了人家有患難就要去救，這是只有一個心一個理，而沒有可以變易或改易的，不可變不可易，就謂之庸，所以說是『庸者天下之定理。』天下事物都有一定不易之理，而不是什末弄新奇巧妙的方法可以徼倖一時，投機取巧而能成功的。我們越是到

最危險艱難的時候，也只要平平正正普普通通照正常的道理做去，必定能達到我們的目的，這就是中庸之定義。」（總裁言論第三冊卷二「中庸的要旨與將領之基本學理」頁二四。）

接着餘釋全書最精要的第一章，這裏把幾個要點摘錄下來：

「天命之謂性——句話……依我看……天命就是宇宙自然推演無盡之生命，論其本體，就是天性天理，也是自然運行之理。論其跡象，則是一切動植飛潛繁衍無窮的生命。我們總理曾說：「人類歷史以生存為中心。」自然之理即是生存，反之即是死亡。這個最基本的自然之理，唯有「中庸」說得最明白透澈，「中庸」說：「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蓋人道天道本是一體，做人即道，道與人之間本沒有絲毫間隔，所以我們要窮究人生之理，即當求之於「仁」，「仁者人也」。人之性即自然之理，如違反自然之理，違反仁道，反乎人性，其人必敗，其國必亡……我們要復興國家，就要把自己汨沒的人性與仁德修明起來，恢復起來，其實這也不是什末勉強的工夫，因為天性與天命與道本是一貫的，所謂「修道」，實在即求合乎自然之理……無論何事何物，必有理存乎其間，能俯察此理而求合之，一切事業未有不成功者。……能修明這一個本乎天性之道，或者指正不合乎道或不合乎理之事物，而使之合乎道合乎理，這就是所謂「教」。我們教民教兵，都只要由其本有之天性而發揮之，便可收到莫大之功效。譬如抵抗強權，裁抑其不合天理之行為而納之於理，也就是一種「教」。

一。同上頁二四四、五。

這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三句話的重要的解釋。人類的天性無不是善的，無論那一個人的本心都是向善的，願意做好人的。教育就是要使他能够敢發其天性，培養其善念，使能屏除一切聲色貨利驕奢淫佚等後天與環境的習染，做一個本色的人，純潔的人，真正的人。這三句話的意思在此，「大學」所謂「明明德」也是這個道理。

其次是講「中」與「和」。「中」就是心未動時之本體，一切無所偏倚的，譬如我們在心境光明潔淨的時候，物慾無慾，就可以達到「大公無私」萬物皆備於我的地位。這樣無論喜怒哀樂無所容懷……而心體靈明，本來自在，這就是「中」的現象。在這個時候，我們只要存着天理本然之善，去乎外誘之私，既不偏於悲觀而失望，也不偏於樂觀而放佚，這就是不易之中，就是天下之大本。所謂大本，就是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至於「和」的意義，乃是心理現象，已經發動時能一一皆中乎節度，我們喜怒哀樂都不過分，都能恰當。……至於「天地位，萬物育」……就是說「中和」之極致，不但萬物各得遂一生存，就是宇宙一切現象，也各循其合宜軌範而無不得其所。我們因此還可以說：天理人常本是人人所共具，此即經常萬古不變之理。人人皆有天賦之性，天性皆具有四維八德的中庸之道；我們只要窮究天理人情之本原，就人人所本有者闡發而力行之。此即所謂率性而行，凡率性而行者，決無畏難苟免之心，更無怕死貪生之理，其視世界一切，真無難事，行無難行，此所謂大智大勇，亦吾總理之所謂「行之非難」，而其大無畏精神之所生，亦在於此也。……再具體一些說，我們能兼持天理本然之

性，擇善固執，堅定革命的信仰，則不但可以求得中國之獨立平等，還可以做到世界大同，天地得所，我們如能由慎獨工夫做到無念不正，無施不當，接物處事，修己教人，一切皆中乎節度，合乎事理，則不僅可以完成革命，保障民族的生存，還可以造成康樂的世界，使萬物皆得其用，人類各遂其生」。（同上頁二五一）

這「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一段話是說一切德性都要取之中庸，無過也無不及。西哲亞里士多德的倫理思想也是如此的。

對於「大學」「中庸」二書，古今許多經生學者解釋不一，大都說得太玄妙而不着實際。蔣委員長却只是平平實實的去解釋，深入淺出，言簡意賅，可以說是對於我國古聖先賢遞相傳習的倫理哲學，賦與了時代的精神和新的生命。

一一 四維八德

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總理在「民族主義」第六講中是時常提到的。總理認定要恢復民族的地位，就要把固有的道德先恢復起來，中國固有的道德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和平。總理說忠是要忠於國，要忠於民，要為四萬萬人去效忠，孝尤為中國的特長，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才自然可以強盛；仁愛也是中國的好道德，墨子所講的「兼愛」和耶穌所講的「博愛」是一樣的，還有所謂「愛民如子」；講到信義，中國古時對於隣國和對於朋友，都是講信的，中國人交易沒有什末契

約，只要彼此口頭說一句話，便有很大的信用，中國在很強盛的時代，也沒有完全去滅人家國，中國更有一種極好的道德，是愛和平，中國人幾千年常愛和平不是出於天性，個人重謙讓，政治上說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有了這種民族精神，民族的地位才能恢復。』

蔣委員長根據總理遺教，再來發揚光大，他認為『民族主義』第六講和『軍人精神教育』等遺教的要旨，在恢復中國固有高尚的倫理道德。他說：『我們要能建設國家復興民族，非先建設國民的心理不可。建設心理之道，即在恢復我們民族固有的道德，尤其是被滯清消滅了兩百餘年的一忠』字，特別要發揚光大。大家要曉得，所謂忠並不是講忠於那一個私人，而是要忠於職責，忠於團體社會，忠於國家民族，如果我們大家盡忠於國家民族，國家民族自然可以復興起來。』——總裁言論第一冊卷一一——總理遺教六講——頁一八二——

關於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蔣委員長在講解黨員守則中講得最明白。現在先把黨員守則前五條寫下來：

- (一) 忠勇為愛國之本
- (二) 孝順為齊家之本
- (三) 仁愛為接物之本
- (四) 信義為立業之本
- (五) 和平為處世之本

這五條完全是講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之重要的，現在再把蔣委員長對於這五條的詮釋錄在下面：（總裁言論第一冊卷一「總理遺教六講」頁六三—五）

（一）因為沒有國家，就沒有我們個人存身家，所以要愛身家，必先愛國家，愛國家即要盡忠於國家。古人講「忠」字，推到極點便是一死。凡能盡忠的人，定要有為國家犧牲的決心與勇氣，所以「忠勇」二字是相連的。惟能忠勇然後可以舉愛國的實效，反之，真能愛國者亦無不忠勇，所以說，「忠勇為愛國之本。」

（二）父母生養我們，教育我們，以至於成立，愛之護之，無微不至，真所謂父母之恩，昊天罔極。我們對於父母，那裏可以不孝順？如果對父母不能孝，則對他人必不愛，對國家必不忠。所謂「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歟。」我們要行仁道於天下，必先行孝養以事父母兄長。孟子說：「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這就是講「孝順為齊家之本。」

（三）「仁愛為接物之本」，是講我們待人接物，應有博愛精神，所謂「仁民愛物」，「民胞物與」，以及「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都是待人接物的道理。

（四）我們要做成功事業，一定要先立所本，古人所謂本立而道生，並不是取巧投機便可成功的。投機取巧的反面，就是誠信等道義。一個人作事，必先要信義昭著，俯仰無愧，然後方能取信於人，亦然務方可以得到人家的幫助，即所謂「得道多助」。尤其是做軍事政治上的事情，格外要能如此，所謂「民無信不立」，由此可見誠信之重要。惟有誠信，然後可以集義養氣，因能集義養氣，必能誠實守信。信義既彰，人格卓

立，然後我們的事業才有成功的基礎，所以說：「信義爲立業之本」。

(五)所謂「和平爲處世之本」，這個道理是很明白的。因爲我們人羣的進化與福利的基礎，在於互助合作。必須和平相處，然後可以發揮互助合作的德性，收到互助合作的效驗。但是處此弱肉強食優勝劣敗的世界，國際間裏想和平，是辦不到的事情。我們中國歷來是崇行王道，當然不主張侵略壓迫人家，但是對於侵略壓迫我們國家的敵人，必須有充足的力量抵抗他，然後才可以真正講和平。所以和敵國作戰的時候，我們一定要爲國家爲民族犧牲，和他作殊死戰，就是只剩下一個人，也要和他奮鬥到底。換一句話說，我們要和破壞和平的敵人奮鬥到底，以保持終極的和平。至於對我們自己四萬萬同胞，都是如手如足的兄弟姊妹，總要相親相愛，絕不好爭鬥妬忌，互相摧殘，總要謙遜禮讓，克己利人，如此立己立人，和以處衆，恕以待人，諺所謂「和氣致祥」就是說處世和平，則一切事情皆可以互助合作，事半功倍，方能得到和衷共濟復興民族的效果。

除八德之外，蔣委員長還提出他的「禮義廉恥」四維來加以發揮。他曾經說過：「總理所有關於修養革命人格發揚革命精神的各種遺教，有一個共同的宗旨，就是要恢復並發揚中國固有優美的倫理道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八德，即「智信仁勇嚴」之武德，亦即我所提倡的「禮義廉恥」之四維。」（總裁言論第一冊卷一「總理遺教六講」頁一七八）

關於禮義廉恥，蔣委員長在「新生活運動綱要」中解釋得非常清楚，非常平實，非常切用。我們今日所以粗野卑陋，爭盜竊乞，亂邪昏懦，流爲非人的生活，完全是缺乏

禮義廉恥的原故：

「我中華民族有五千年之文化，其食衣住行之法則，本極高尚，時至今日，反有粗野卑陋之狀態，而不免流為非人的生活者，厥為禮義廉恥」不張之故。」——總裁言論第三冊卷六「新生活運動綱要」頁一（三）

（我中華民國有三千五百萬方里之土地，其食衣住行之資源，本極豐富，時至今日，反多爭盜竊乞之現象，而不免流為非人的生活者，厥為「禮義廉恥」不張之故。」（同上）

（我中華民國有四萬萬之人民，其食衣行之組織，本極鞏固，時至今日，反呈亂邪昏憊之現狀；而不免流為非人的生活者，厥為「禮義廉恥」不張之故。」（同上）

禮義廉恥不張的結果，造成這樣的非人生活，要革除這種非人生活，自然只有從事於禮義廉恥的提倡，使國民都過禮義廉恥的生活。那末，禮義廉恥的生活是怎樣的生活呢？蔣委員長告訴我們（同上頁一一〇）：

「禮」是規規矩矩的態度——禮者，理也，理之在自然界者，謂之定律；理之在社會中者謂之規律；理之在國家者，謂之紀律。人之行為，能以此三律為準繩，謂之守規矩。凡守規矩之行為的表現，謂之規規矩矩的態度。

「義」是正當當的行為——義者宜也。宜即人之正當行為，依乎禮合於自然定律，社會規律，與國家行律者，謂之正當行為。行而不正當，或知其正當而不行，皆不得謂之義。

「廉」是清明白白的辨別——廉者，明也能辨別是非之謂也，合乎禮義為是，反乎禮義為非，知其是而取之，知其非而舍之，此之謂清明白白的辨別。

「恥」是切切實實的覺悟——恥者，知也。即知有羞惡之心也。己之行爲，若不合禮義與廉，而覺其可恥者，謂之羞。人之行爲，若不合禮義與廉，而覺其可恥者，謂之惡。惟羞惡之念，恆有過與不及之弊，故覺悟要在切實。有切實之羞，必力圖上進，有切實之惡，必力行消雪，此之謂切切實實的覺悟。

在新生活運動四週紀念廣播演講中，蔣委員長將禮義廉恥作進一步的解釋，他說：「我們能明禮，就要臨難無苟免；能重義，就要舍生而取義；能守廉，就要清清楚楚的辨別公私邪正之分；能知恥，就要切切實實的覺悟奇恥大辱之重。」總裁言論第三冊卷六一新運四週紀念廣播詞（頁八九）

禮義廉恥四者是互相連貫的。恥是行爲的動機，行是行爲的嚮導，義是行爲的履踐，禮是行爲的表現。發於恥，明於行，行於義，而形之於禮，相需相成，缺一不可。所以蔣委員長又告訴我們說：

「禮無義則侈，禮無恥則詬。此好，侈，詬，皆似禮而非禮者也。」

（同上頁一一一）

「義無禮則犯，義無廉則濫，義無恥則妄。此犯，濫，妄，皆似義而非義者也。」

（同上）

「廉無禮則僞，廉無義則吝，廉無恥則污，此僞，吝，污，皆似廉而非廉者也。」

(同上)

「恥無禮則亂，恥無義則忿，恥無廉則醜，皆似有恥而無恥者也。是誠所謂『恥非所恥，則恥蕩然矣。』」(同上)

「無論孔門講六藝，與管子倡四維。都以禮為首，可見禮是為學與做人的第一要件。蔣委員長認為四維中以禮為最重要，所以不憚再三的告誡我們說『一切言行要從確實着重下手，所謂確實着重的精神，再進一步講，就是禮義廉恥四維中之『禮』字的意義，一般人以為從前所謂禮不過是三詭九叩首，現在所謂禮不過這擊手立正鞠躬而已，以為只要知道這種種，便已算是知禮，此外再不知有什麼叫做禮了，這種狹隘的解釋完全錯誤。大家要知道，禮的範圍非常廣泛，一個人無論起居飲食，舉止言語，小而洒掃，應對，進退；大而治國平天下，隨時隨地皆應當有合理的節度和規矩，這種合理的態度的規矩就是『禮』，所以無時無地沒有禮，隨時隨地要講禮……四維之中，以剛才所講的『禮』為最重要，禮就是實踐四維，真正做人的起點。……現在再要簡單的提示禮的條件：第一，在形式上，禮一定是有分寸有節度的一種節文，所以叫『禮節』『儀節』，如果失其節度，無論不及或過分，便都不成禮。……其次，所謂禮一定有理，就是一定要合乎義理，合乎道義。……換句話講，禮就是社會道德的節文，以義理為其真實的精神。所以如果失此義理，禮便沒有精神，一切便都成為虛有其表的假東西了。因此我們重『禮』，並不是注重形式上之節文，尤其是要注重內在的真實的精神，則義理的思想。』(見『禮』二十三年八月七日出席軍官團降旗典禮訓話)

總結起來說，不外是：

- (一) 提倡「禮義廉恥」，使反乎粗野卑陋之行爲，求國民生活之藝術化。
- (二) 提倡「禮義廉恥」使反乎爭盜竊乞之行爲，求國民生活之生產化。
- (三) 提倡「禮義廉恥」，使反乎亂邪昏懦之行爲，求國民生活之軍事化。

以上是蔣委員長對於四維八德的發揮，這裏再引他的話來作結束：「三民主義的根本精神，就是 總理所講『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我們如果能够照八德去做，就可以帶部下，救國家，實現三民主義。但是要做到八德，又要從那裏着手呢？換言之，就是要如何才能盡忠孝，行仁愛，尚信義，講和平呢？就要先能實踐禮義廉恥四維。我們無論做什麼事，都要合乎禮義，合乎廉恥，凡是無廉無恥，不忠不孝的事不要做！凡是無禮無義，不仁不信的事也不要做！這是訓練我們自己 and 一般部下來實現三民主義的第一步。如果我們真正能夠實踐四維，就是完成八德，實現三民主義。（見軍人應確定三民主義之中心信仰）又說：『我們古來立國的基础，在道德的教條方面說，是以禮義廉恥爲四維，但表現到行爲方面，則以忠孝仁愛爲中心，今天的時代，正是要求我們國民爲國家盡忠，對民族祖先盡孝的時候，正是我們國民發揚愛國愛民博愛的精神，來實現我們民族固有道德，以抵抗強暴消滅侵略的時候。』（總裁言論第三冊卷六新選四週紀念廣播詞頁八五）

三 智仁勇信

智仁勇三達德，總理在「軍人精神教育」中間論得極詳盡，蔣委員長根據總理所講的再加發揚光大。現在，先將「軍人精神教育」中所論的智仁勇，概括的寫出來：

一、智的定義——有聰明，有見識，合於道義。

智的範圍——宇宙的範圍皆為智的範圍。

智的來源——（一）由於天生者，（二）由於力學者，（三）由於經驗者。

軍人的智——（一）別是非；利民利國為是，害民害國為非。

（二）明利害；是則為利，非則為害。

（三）識時勢；審時機之成熟與否，度勢力之順逆難易。

（四）知彼己；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二、仁的定義——博愛，公愛而非私愛。

仁的種類——（一）救世之仁（宗教家），（二）救人之仁（慈善家），（三）

救國之仁（愛國志士）。

軍人之仁——捨身救國救民，實行三民主義。

三、勇的定義——不怕。

勇的種類——（一）發狠之勇，（二）血氣之勇，（三）無知之勇。

軍人的勇——（一）長技能；命中，隱伏，耐勞，走路，吃粗。

（二）明生死；不明生死，不能發揚勇氣。

蔣委員長在「軍人精神教育釋要」中，更加發揮。關於智的方面，他說：「現在」

般稍有聰明有才幹的，往往見利忘義，所謂「利令智昏」。這種智不是我們所要求之智。我們所謂智，必依據道義，智的根本必植基在道義。如若不然，有聰明有才幹，徒爲濟奸作惡，危害國家社會之具。……智之由於天生者，例如孝父母，知廉恥，耳能聽，目能視，飢則食，渴則飲，都是與生俱來的本能。其次由於力學者，因爲一個人天生的智能有限，應付環境究屬不夠，必須採納衆長，補我所短，融合多數人的聰明爲聰明，接受多數人的知識爲知識，以擴充智的範圍。再其次由於經驗者，這種智完全是自己從實際的經歷中體察而得，所以一個人所受的艱難磨折所有的經驗閱歷愈多，其智識亦愈增進，受挫忍辱的時候，就是增長德業智慧的機會，而從這種機會得來的智，較之天生與力學所得來的，更爲切實可貴。……軍人一定要明白大義之所在，不要以個人小的利害爲中心，而要以整個國家民族大的利害爲中心，真正聰明的軍人，必犧牲小我以貢獻於大我。……所謂「別是非，明利害，識時勢，知彼己，」四者之出發點則爲道義，合乎道義，乃得謂之大智，違乎道義，雖智亦愚。」

關於仁的方面，他說：「愛的範圍本有廣義與狹義之別，愛世界愛衆人愛國家，乃爲廣義的；愛個人與家庭，乃爲狹義之愛。……軍人所愛者廣而大，惟其所愛者廣而大，則對於小愛的犧牲亦所不惜。故古來一般仁人志士，毀家紓難，大義滅親而不反顧，一以達到其大愛爲其目的。所謂「公爾亡私」「國爾忘家」就是博愛精神的充份表現。……軍人之仁、乃是愛整個國家民族全體人民之大仁。我們以道義之智爲基礎，辨別是非，判明利害，在三民主義之下，確定達於大仁的道路，完成自己所負的使命。」

關於勇的方面，他說：「遇任何危險，任何困難，不畏意不規避，以全力赴之，以實心應之，必可打破危險，克期困難，達到自己的任務。……不過軍人之勇，必須有一定的道義，有一定的目的和一定的方法，所謂「有勇知方。」否則，誤用其勇，不但個人無好結果，國家社會都要蒙其大害。古人所謂「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所以我們軍人之勇，必須為有主義有目的有智識之勇，如此之勇，才有意義，才有價值，才有效果。……所謂大勇乃係有主義，有目的有知識的勇。大勇之勇，乃為為國家為人民而奮鬥犧牲之勇，成則利國福民，不成則成仁取義，其為光榮，乃為無上之光榮，其為價值，乃為無上之價值。……我們身為國家軍人，以救國救民為職志，以大仁為依歸，斷非小勇足以其濟事，必賴大勇方能達到目的。我們既然有三民主義，便有中心的信仰，在中心信仰之下，必能共同一致鼓舞最大的智仁之勇。」

將智仁勇三德說明以後，他便作了結論說：「我們要救民救國，一定要有大智大仁大勇的革命精神，發揚這種精神，然後可以確立革命的人生觀，不為偷生怕死的庸人和禍國殃民的罪人，一定能夠為國家為民族和為主義而犧牲，做一番驚天動地的革命事業，發揚我們生命的光輝，復興我們的國家與民族！」

為要說得詳明一點，他又引申 總理的意思，加上「信」和「嚴」兩項。他說：「岳武穆所說的「智信仁勇嚴」之武德與 總理遺教「智仁勇」三者實可相互發明，為現代革命軍人必備之要素。關於「信」與「嚴」的解釋，歷來講的人也很多，普通的意思，大家想必也很明白。不過所謂「信」，第一是要對主義有共信，第二是要上下與朋友

之間要有互信，第三是要對自己有自信。（專就部隊裏縱的系統來說，就是要信仰上官，相信自己，信任部下。）所謂「嚴」，第一先要嚴以律己，然後嚴以待人。這是要補充說明的。（總裁言論第一冊卷一「總理遺教六講」頁一七七）

「信」也就是「誠」。「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所謂「行之者一」，就是說要貫徹到底，要篤行，也就是「誠」。因此蔣委員長說：「篤行是什麼？怎末纔能夠篤行？這在智仁勇上面，就是一個誠字。怎樣去篤行？篤行就是我們知道三民主義是好的，是可以救國，無論如何，死心塌地，任何犧牲任何痛苦任何危險都不顧，我們只是實實在在去實行。總理的三民主義，這樣才能夠說是篤行，才能夠叫做誠。」（總裁言論第一冊卷二「要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先要抵抗日本武士道的精神」頁八〇）

信仁智勇四德和禮義廉恥四維，完全是相通的。禮通於信，義通於仁，廉通於智，恥通於勇。蔣委員長在「禮義廉恥的精髓」一文中，關於這種相通的道理指示得很明白：

「禮」通於「信」——「禮」其實就是「信」，「信」包含「誠實」，「準確」，「信義」諸義。守禮的人必定是俯仰無愧，誠篤不欺。所謂「禮儀」「禮節」和「禮法」，實行時必須有「誠實」的心思，「準確」的儀式，和絲毫不能夠且的節度。禮是共守的軌範，也是信義的基礎。

「義」通於「仁」——「仁」就是「博愛」，就是「為人」。如果抱着「博愛」的

主義，存着爲人的心思，再表現於我們一切行爲施之於諸般事物，爲他人爲社會爲國家造福，這就是「義」。所謂「義勇」「義俠」和「義務」，無不是指犧牲自己以利他，而利他之心是由「仁」發生的。所以「仁」與「義」實在是一個東西，就其存之於心而言謂之「仁」，就其施之於事而言謂之「義」。

「廉」通於「智」——「廉」包括稜角分明，界限清晰，公私釐然，邪正有別諸種意思。唯有見理透澈，智識豐富的人，才會明瞭公私是非而慎於取舍。所以「廉」之意義實在通於「智」，不智的人不能廉，不廉的人其實就是不智。

「恥」通於「勇」——「恥」就是「勇」。古人說「知恥近乎勇」，因爲有恥的人，一定有「恥不若人」的覺悟，一定有刻苦奮鬥的勇氣，一定有犧牲敢死的決心。「勇」就是「不怕死」，知恥的人一定不怕死，怕死的人都是因爲不知恥。

「總之，「信仁智勇」完全與「禮義廉恥」相通，「禮義廉恥」是民族道德之體，「信仁智勇」可以說是民族道德之用，能够實踐禮義廉恥的人，必定能够發揮信仁智勇以達於極致。要救中國目前反覆虛僞浮夸凌亂的風氣，唯有齊之以禮，使民能崇信；要救中國目前澆薄殘忍冷酷自私的風氣，唯有示之以義，使民能與仁；要救中國目前貪婪放浪義利不分的惡習，唯有有的之以廉，使民能有辨別真正是非的智慧；要救中國目前怯懦苟且墮落消沉的惡習，唯有勵之以恥，使民能有感激效命犧牲奮鬥的勇氣。」（見「禮義廉恥的精髓」）

第二章 政治思想

一 國家論

凡是讀過政治學的人，都知道國家的要素是人民，領土，和主權。不過近代政治學者，也有於人民領土主權之外，再加上政府一個要素的。美人迦納（Merrill）就是如此主張的，他對於國家所下的定義是：「國家是一個由很多人民所組織的社會，永久佔有一塊一定的領土，不受外來的統治，有一個為人民在習慣上所服從的有組織的政府。」

蔣委員長對於國家的見解也是一樣，他說：「一個獨立國家，必具土地，人民，主權三種要素。如只有土地而無人民，則土地無用；如只有人民而無土地，則人民無所寄托；如只有土地與人民，若無統治權力所發出的中央政府，亦不能成爲一個國家。所以土地，人民，與主權，是構成國家不可少的基本條件，因此軍人愛國的具體目的，即在於愛領土，愛人民，和愛政府。」（見「軍人精神教育釋要」）

在這裏，他特別指出統治權力所發出的中央政府，愛國家就要愛政府。國家是爲增進共同目的，滿足共同需要，有政治組織的整體。政府是國家的機關，行使國家主權的工具。領土是國家行使主權的範圍，國家在牠的領土內，選用政府這個工具來表示并執行人民集合意志，決定大政方針，管理共同事務，促進共同利益，這一切的措施，完全是爲了牠的人民。國家以人民爲本，人民依存於國家，國家超於人民之上，國家是至

高無上，超然偉大的，人民應該愛護國家尊敬國家。蔣委員長在「國旗與軍樂的意義」中說：「國家是超然偉大而又看不見摸不着的東西。我們從什末地方來愛護他？拿一個什末具體的東西表現出來，給我們愛護呢？這就是國家的標幟——國旗。國旗不僅是代表我們國家的神聖標幟，而且是我們整個民族上自祖先皇帝下至我們以及將來千秋萬世子孫孫的精神和生命所集中歸托之處。……我們一看到國旗就等於看見我們的國家和祖先以及自 總理以下一般為革命犧牲的先烈，就要肅然起敬，奮然興起，要在我們手裏繼續保持並發揚光大我們祖先五千年來偉大的民族生命和文化，救起我們的國家，復興我們的民族。」又說：「現在的黨歌，即代用的國歌，所以黨歌即代表革命黨和中華民國的聲音，我們一聞其聲，便要肅然起敬。」

國旗國歌是整個國家生命的具體表現，代表整個國家，所以我們看到國旗聽到國歌，就要肅然起敬。蔣委員長提倡早晚升旗降旗，奏軍樂，唱黨歌，就是要我們愛護國家尊敬國家。

國家雖由人民，領土，主權，政府等要素所構成，但國家並非一種集合體，而是一種統一體，有機體。此種統一的有機體是有生命的，有靈魂的。蔣委員長在現代國家的生命力中說：「現代的國家乃是一個最發達到極度的一個有機體。有機體的物質就是生活的機能，不斷的新陳代謝，不斷的發榮滋長，自主的努力完成其理想的生命。」（總裁言論第三冊卷五「現代國家的生命力」頁二六五）又說：「國家這個東西，是一個有機體。這就是說，國家是一個有生命的，超於一切的集體組織。它全部的機構，就是

一個完密的生命全體。每個國民，就是構成這個生命全體的一個細胞。而全民族的歷史文化，就是它生活的史實和精神的產果。而此種歷史文化之傳種的根本精神，就是國家的靈魂。國家就是因為有此靈魂，所以成爲有生命的構體，而非死的無機物。(同上)

國家是有機的，活動的，具有生命的活力。然則所謂國家的生命力，到底是什末呢？蔣委員長告訴我們是教育、經濟、和武力。所以他說：「現代國家的生命力是什末？

第一就是教育，第二就是經濟，第三就是武力。這三種力量缺乏一種或有一種不健全，便不能建設完全的現代國家。我們現在如果不能認識三種生命力而找到正確的途徑，努力來培養充實這三種根本的動力，那一定不能建設新的國家。大家曉得，現在我們中國還是有教育，有經濟，也有武力，但是爲什末教育不能收效，一般國民仍舊不能來共同救國呢？爲什末我們的經濟不僅不能繁榮建設，反而國民經濟凋弊，國計民生日益艱苦呢？爲什末我們的武力不足以抵禦外侮，保存領土，復興民族呢？就是因爲自民國成立二十多年以來，都沒有真正照着建國的方法來努力培養這教育、經濟，武力三種生命力，所以直到現在國家還只有一個形式、而沒有真實的力量，始終不能建設起現代的國家」。(同上頁二六六)

國家的生命力既是教育，經濟，武力，現在再根據蔣委員長所講的，將這三種生命力分別加以說明。教育的內容包括智識，道德，體魄、羣性，四育；智育是指一切學術的修養，德育是指實踐四維發揚武德（智、信、仁、勇、嚴），體育是指強健的體魄，羣育是指統一意志團結精神。教育是經濟和武力相聯繫的總樞紐、它的主要方針應在發

遂經濟和增強武力，實施軍國民教育，除了各種科學上的智識技能之外，更須有一切精神上的訓練，改良社會的舊習俗、樹立現代軍國民的新風氣；這樣的教育，才算是真正救國的教育。救國的教育務須矯正過去一切空疏，迂闊，文弱頹廢，散漫的積習，造成活潑，進取，強毅團結，力行的新風氣，這樣才能算是行的教育，才可以充實國家的生命力。經濟的內容包括勞力，土地，和資本，三者妥為運用，改良生產方法和經營方法，促進生產，調節消費，這樣才能充實國家的經濟力量。教育要講求軍國民的教育，經濟也要講求軍國民的經濟。武力的內容不僅是指軍隊和武器，只有軍隊武器，還不能說是國家的武力已經充實，要充實國家的武力，必須做到全國總動員。國家一切的設施，全體國民一切的活動，都要以全國總動員為最後的總目標，勵行普遍的嚴格的軍事化。總之，教育經濟武力聯合並進，共同發展，才能完成全國總動員，才能充實國家的生命力，使得國家這個有機體具有最大限度的生命的活力。

最後，國家的生命力是教育，經濟，和武力，國家的目的也就在教民，養民，和保民。用國家的充實的教育力量。來教人民，使人民接受智德體羣四育的訓練，提高文化的水準，發揚民族的精神。用國家的充實的經濟力量來養人民，使人民滿足食衣住行四大需要，發展國民的生活。用國家的充實的武力來保衛人民，使人民不受外來力量的侵略和壓迫，達到武力成為人民的武力。

二 民本論

人民是國家的要素之一，國家以人民爲本，人民也不能離開國家，不能沒有國家，人民應該愛國家，國家應該爲人民謀幸福。救國家先要救人民。所謂「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在「救國的基點」裏，蔣委員長這樣指示我們：「我們要就國，一定先要救民，要救民首先要使一般國民知道做人的道理，能够照着做人的道理來做成正堂堂的一個「人」，而且要做一個完完全全的「中國人」！……因爲人有他的特殊靈性，有他生活的目的，知道做人的道理，曉得人和禽獸的分別，能够發揮人類高尚的習性，向着高尚的目標邁進不已，而自覺自主的做成一個與禽獸絕不相同的所謂「人」。』（總裁言論第一冊卷二「救國的基點」頁二一一—二二）

那末，怎樣才能够做一個堂堂正正完完全全的人呢？做一個堂堂正正完完全全的人，必須要：

- 第一，重秩序，守紀律。
- 第二，明地位，負責任。
- 第三，崇主義，復國魂。
- 第四，揚武德，張四維。

這四項做好人民的基本條件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切實明白，無須再加說明。不過「復國魂」的「國魂」就是指三民主義。蔣委員長說：「我常常講過，國家是一個發

展到極度的有機體……，國家也和一個人一樣，還有內在的靈魂。如果失了靈魂，只存軀殼，便不成其為有機體的國家，國家就如人衰老一般，便要死亡。我們中國現在就是因為喪失了靈魂，乃至危亡如此。今後要救轉我們的國家，必須先找回我們的國魂。中國的國魂是什麼？就是三民主義。」（總裁言論第三冊卷五「現代國民必備的條件」頁三〇五）

反之，如果不能做到這四種條件，便會隨隨便便污穢卑劣，偷惰苟安，頹唐腐敗，沒有人格；喪失了精神道德，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一個國家有了這樣的人民，還不會亡國嗎？所以救國先要救民，要救民首先就要使民具備上述良民的條件。如此本固而後才能邦寧。

全國人民都做到優秀健全的人民以後，還要進一步使人民能夠享受幸福，換言之就要做到國計優裕民生樂利的地步，這樣就本益固而邦益寧。要達到這種地步，蔣委員長告訴我們必須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我們再看他是怎樣的說明這四點，

「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為治國的大本。正就是我們現在從事政治建設的目標。不過大家更要曉得，所謂政治建設的目標，分開來講固然應當同時舉出這四個來，若是就政治的根本作用，將政治建設的目標，講得更簡明更澈底一點，可以說政治建設唯一目標就是「民生」。總理在「建國大綱」中指示我們革命建國最重要的「一句話說，「建設之首要在民生。」這句話真是一語破的，指明了我們政治建設的

中心目標。我們之所以要革命，要從事政治建設，我們之所以要管理衆人的事，要做到人無遊民而各盡其才，地無荒土而咸盡其利，物無廢棄而各盡其用，時無虛耗而用得其宜，事無廢弛而克舉其效，最後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使天下事事物物皆安排妥當各得其所，全體人民個個都能安居樂業足食足衣。宋儒呂新吾所說：「爲人上者，只是使所治之民，個個要聊生，人人要安分，物物要得所，事事要協宜，這是本然職分。」就是這個意思。本來政治的內容，分析起來，雖然包括經濟，教育，倫理，社會，軍事，交通等等，但綜合起來講，就不外「國計民生」四個字。一切政治的設施，無非是要使國家富強，民生樂利。必須能夠如此，才算是政治。我們中國的政治進步很早，政治學說也很發達，我們無論從事實與學理來考究，可以說無論那一個偉大的政治家都是以民生爲政治之大本。禹謨所說：「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孔子主張「既庶加富」，「足食足兵」；到了孟子，更特別將政治以民生爲主要的道理闡發詳盡，所謂「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所謂「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至於管子所謂「倉廩實則知禮義，衣食足則知榮辱」，更是歷來政治上最要緊的格言。我們由這些古訓，已可認識政治的中心目標所在；，如果再研究現代各國政治的性質，可以說政治與經濟息息相關，簡直是整個的，不可分的。不僅政治上最大部分的工作完全是屬於經濟的範圍，而且政治的基礎就在於健全的經濟，我們甚至可以說，經濟情形是決定政治的惟一主要因素。就國家的觀念來看，也就是所謂「國計民生。」（總裁言論第一冊卷一總理遺教六講）頁一九——

二一)

蔣委員長這段話是根據總理當年的「上李鴻章書」而來的，總理說：「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接着總理便逐條說明如何才能做到這四項事情。現在把牠列舉在下面，作為本節的結束。

一、人盡其才：

- (一) 教養有道——天無枉生之才。
 - (二) 鼓勵以方——野無抑鬱之士。
 - (三) 任使得法——朝無倖進之徒。
- } 百事興

二、地盡其利：

- (一) 農政有官——百姓勤
 - (二) 農務有學——樹畜精
 - (三) 耕耘有器——人力省
- } 民食足

三、物盡其用：

- (一) 窮理日精——物用足
 - (二) 機器日巧——成物多
 - (三) 不作無益——物力節
- } 財力豐

四、貨暢其流：

- (一) 無關卡之阻難——商賈願出於其市
- (二) 有保商之善法——殷富亦樂於貿遷 財源裕
- (三) 輪船鐵路之載——則貨物之盤費輕

三 仁政論

國家以人民爲本，政治建設的唯一目標是「民生」，中國政治哲學的根本是在行「仁政。」中國的政治哲學和倫理哲學原是合一的，政治是以倫理爲基礎的。蔣委員長極注重這種「仁政」，時常提出「中庸」的「哀公問政」一篇和「大學」的「禮運」一篇對我們講解，在「政治的道理」中尤其說得透澈。他分六段闡明「哀公問政」章的內容要義，每段都列舉重要的原文加以解釋。（總裁言論第一冊卷二「政治的道理」頁二八三——二九四）

(一) 說明政治要以人爲本，要有人來運用，要合乎人類的本性，要以修養人格和推己及人爲推行的根本。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這裏所謂人並不是指個人，乃是指多數人。必須有明瞭這個政制的原理和價值的人，然後良好的政制才有人來運用，才有人來實行。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蘆也」。——蒲蘆是最易滋長之物，政治如果不要違反人類的本性，就像植物得到養料一樣，必能推行無阻，而且成長得格外迅速。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這是主旨，自始至終都注重在人，所謂「仁」亦只是人道人性，換言之，就是人對人的關係，和人與人間共通的理性，以此修道，以此修身，再以修明的人格影響他人，吸引他人，政治就可推進。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無論仁與義無論親親與尊賢，皆應施行得當，毋使有過與不及之處，故一切行政皆要折中於禮，而且要以禮來節制。否則就要亂了，就不成其爲政治了。

（二）說明政治應該由各人對家庭，社會，和國家完滿負責做起，說明所謂五達道和三達德。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此者天下之達道也。」——達道是指人人所應該履行的大道。所謂君臣關係，現在就是國民對國家的關係，忠於衆人，忠於事。至於父子，夫婦，昆弟是個人對家庭的關係，朋友之道，推而廣之，就是個人對社會對團體的關係。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不論對家庭對社會對國家，要盡到責任，就必須要有良知（知）良能（仁）和決心（勇）。不論求知行仁尚勇，都要貫徹到底，所謂「仁」就是成己成物的「誠」字。五達道是對人的關係，三達德是盡己的本務。

（三）說明修養人格的重要和效果，要大家努力自強，不自暴棄，乃必有成。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

之，或勉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人類資性有高下，環境有難易，聞道有先後，祇要鏗而不舍，最後個個人必能同樣地達到終點。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仁勇是人格的標準，好學，力行，知恥是修養的入手方法。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這是與修齊治平的道理相互發明的。

（四）說明為政之常道在乎由內及外，使天下人從最親近到最疏遠的都能各得其所，來達到政治的目的，就是所謂「九經」。將委員長先將「九經」列一個表，再擇要加以說明

項目	方法	效	果
修身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	道立	
尊賢	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	不惑	
親親	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	諸父昆弟不怨	
敬大臣	官盛任使	不眩	
體羣臣	忠信重祿	士之報禮重	

子庶民	時使薄歛	百姓勤
來百工	日省月試，既稟稱事。	財用足
柔遠人	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	四方歸之
懷諸侯	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	天下畏之

「親親」——現在是民國時代，「親親」二字的解釋應該推廣開來，不限於父子兄弟夫婦。這「親親」二字至少要作黨員和黨員的親親來解釋。便是親親的方法，也不是要「尊其位重其祿」，而是要竭誠扶助，使各得其所，各盡其分，就是要同甘苦，共榮辱，這是我們應守的道德標準。

「體羣臣」——要與一般幹部和同志同甘共患難，不但恤其困乏，量他的工作而優給報酬，還要以忠信為先。忠的意義包括「恕」字，推己及人謂之恕，信就是講信修睦。我們能推己及人，能講信修睦，就能使部屬同事踴躍盡力。

「子庶民」——是要「時使薄歛」。所謂「時使」，就是要發動民衆為國家服務，但要不奪其時，不妨礙他的生業，然後雖勞不怨。

「來百工」——所謂「日省月試，既稟稱事」。這在現在不僅是對於百工而已，我們對於部屬同事，都要規定工作計劃，督率進修，每日有每日的考核，一月有一月的考核，乃至年終成績，給以升降獎懲，都是這個意思，這就是要綜核名實的道理。至於「

既稟稱事」的「既稟」二字，原文是「饋稟」，古時以穀代錢，看他的工作，定他的俸祿或工資，要使報酬和工作相稱，不能使部下無功受祿或工少而酬多，這樣就叫作「饋稟稱事」，這亦就是政治要賞罰嚴明的道理。

「柔道人」——在我們這個時代，就是對於邊地民族的同胞，我們要一視同仁，爲他們開闢交通便利來往，尊重他特有的習慣，使他們起居供給便利。如果文化程度上和內地有所差異，那末我們對於他的缺點，切不要菲薄他譏評他，而對於他們中間比較進步的分子，更要特別的獎勵他扶助他，這就是「嘉善而矜不能」。

「懷諸侯」——這更是我們中國古來最高尚最博大的政治理想。「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就是說人家已被摧殘了的獨立主權，就要扶助他繼續起來，已經廢除了的國家民族，乃要扶助他恢復獨立，暴亂要替他治平，顛危要替他扶持。這可說是我們國民革命援助一切被壓迫民族的精神。我們決不乘人之危，反之，我們還要仗義尚俠，替別人謀幸福。我們一切要自給，並不取求於人，我們還要多所貢獻於人，這就是所謂「厚往而薄來」。

（五）說明一切事業開始以前須要有預備，也說明原理原則是一切行動的前提。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這裏所謂「一」，就是一「誠」字。九經是行的綱目，誠是行的原理。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一切事都要事先有豫見，有豫定，有豫備，不論爲學，爲政，作事，必須要豫想開始以後的情形。所以未開始以前，就要豫定種種的計

翻步踏，凝結一切，如此乃能成功，反之就會失敗。

「言前定則不跲」——跲即躓，所謂不躓，就是站得住，說得通，行得開，不是信口亂說，隨便應付。

「事前定期不困，行前定期不疚。」——凡做事必須有預定計劃，而後才免於後悔。

「道前定則不窮」——如果先將原理確立了，然後對於各種不同的事項以及各種可能的變化，皆能够措置裕如，一切合乎機宜，不致窮於應付。

（六）說明一切政治的原動力在乎「誠」，而完成「誠」之德性，要靠力學與篤行。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這是說天地間的現象，只是圓滿貫徹，永久不變，人類要合乎天理，是全靠修行。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古時所謂聖人，是完滿的人格之意，而並不是一種天生特別的奇才。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是說明誠的本能，應着上文「天之道也」而言。

「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這是人人立業，以達乎理想標準的途徑。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這是修養學習的階段。

「篤行之」——這是踐履篤實，力行貫徹的階段。

「自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這是說所知未廣，務求其博，一切學問必要求

其澈底明瞭。

「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這是說要事事留心，事事虛心，當其未做，問之必審。

「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這是說有了學問，還要運用思想，學問求就求審，但思想則求其慎，因為思想不能漫無軌道去求，不然博是馳騖空想，所以學問要博要審，而思維則以慎密為主。

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這就是擇善的工夫，辨擇道釋，方法，和途徑的時候，必然要透徹內外，有得於心，洞明牠整個的內容，然後才固執此理此法，安心奉行。

「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篤與誠在意義上是連用的，篤行就是貫徹始終，完滿達成的意思，也就是「力行」。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與強即是誠的兩面，明是光明徹照，絕無滯礙，強是自強不息，貫徹到底。以上六段說明了「哀公問政」的內容。為政的原理，為政的方法和步驟，為政的先決條件，為政的內容和項目，一切「為政之要」都說明了。最後提出一個「誠」字作為政治的基本。「誠」實在是一切骨幹。知仁勇三達德由此而生，九經由此而行。「誠」是修己治人的根本，一切事業的力。

其次，關於「禮運」一篇，蔣委員長說：「中國的政治理想，是側重義務而不制重權

稱的，是主張服務和互助共濟的，是主張多所生產創造而少所消費的，是主張以能力強者的勞動支持能力弱者的生存的，是看重人與天然爭而蔑視人與人爭的，總之是主張不侵不奪安樂共存的。看「禮運」上所說：「人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這種博愛思想已經够明顯了。下面一段更重要，我們要注意他所謂「老有所終，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就是說，對於能力已衰退的或未成長的，以及無依無靠而疾病痛苦的，要以公共的力量去供給他，養育他，扶持救濟他。但是對於壯者却不說有所養，而說「壯有所用。」接着又說「男有分，女有歸。」可知對於一般能力壯健的，都要責成他們勞動服務，不論男女，都要使他們有所貢獻於生產。所謂「有所用」就是要人盡其才，人盡其力，為自己的生存和公眾的福利而服務。「貨不必藏於己，」但「惡其棄於地，」力不必為己，「但」惡其不出於身，「這兩個惡字，可見得那時的政治理想，就以開發天地為人生本務，以游惰和自私為眾所共棄的惡德。如果天然的資源之開發，不論是誰荒棄了的，却是人人共有的恥辱，如果有了力量，不為公眾而使用，就要招受公眾的鄙棄。這真是天下為公，協作互助的和平世界，人類最高尚最完滿的大同社會，」（同上頁三〇——二）

又說：「我國古時政治哲學特別注重於疾病痛苦困窮的救濟。古時所謂仁政，就是要發動人民的力量，救濟人民的痛苦。為政之要，就在於竭盡能力，定出方法和計劃，來救治人民的困乏與痛苦。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這是但負政治責任的人應有的自覺。古時以鰥寡孤獨四者為天下之窮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

仁，必先此四者，這四種人，有的是老而無依，有的是幼而無恃；古時候因為要使沒有一夫不獲其所，對這些人是首先顧慮得很周到的，「可見養老育幼，是政治的務要，而政治的出發點完全是在民生。至於病者，傷者，殘廢者，更是特別受到公家的救護」（同上頁三〇四）

「中庸」的哀公問政「和大學的「禮運」，完全是講仁政的。所以蔣委員長說：「這種政治理想（指「禮運」篇）。與「中庸」所說「九經」「五達道」配合起來看，實在是仁至義盡，極平易，也極自然的理想。和歐洲國家以私人資本「佔有慾」來激勵生產，或是利用人類嫉忌爭奪的物慾，來強求「唯物史觀」和「社會革命」的方法相比較。具有天淵之別了。這種理想的所由發生，以「天理」為其思想之背景，所謂天理只是人人心中所同具的本性。」（同上頁三〇三）

救國救民，非行仁政不可。否則，就如「樂記」上所說的：「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智者詐愚，勇者苦法，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四 行政論

在蔣委員長的政治思想中，最後，還要提出這「行政論」來說。「行政論」可以說是講行政的方法和步驟，講政治如不懂行政的方法和步驟，那末任憑你有多末遠大的政治目標，也是不能推行順利，效率提高的。蔣委員長論行政提出六點來指示我們。

第一：除舊布新，因勢利導。建設現代的政治和現代的國家，一定要不斷的除舊布新，洗刷過去一切不良思想，風氣，習慣，制度等等，依據新的思想——革命的主義，訂出新的方案。造成新的風氣，推進一切新的事業。一方面要除舊佈新，一方面在方法上技術上更要注重因勢利導，總是要因應現實的趨勢，想方法運用現實的事物而達到理想的目的，完成一切新的事業。孔子所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擇其可勞而勞之，「所謂「因材施教」，以及「史記」中稱讚管仲的政治本領所說：「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以為福，轉敗而為功。……這些都是因勢利導的道理，更可提出「以民治民」的辦法，就是利用民衆的力量，來做人民本身有利的事業，也就是孔子所謂「惠而不費，勞而不怨。」——如何才可以「惠而不費」呢？孔子說：「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至於「勞而不怨」，孔子也已經講明：「擇其可勞而勞之，又誰怨？」

第二：教養兼施，循序漸進。現代的政治和經濟不能分離，政府的職務不僅在治理政事，必須更要發展經濟以解決民生問題——教民養民。必須教養兼施，才可以治民，才算是盡了政府治民的職責。所以現代的政治，是積極的教養兼施的政治，決不是如過去一樣只要不擾民便算是善政的那種消極變遷的政治；當然更不是擾民害民，自私自利，那種殘民以逞的黑暗政治。但是要求教化成功，民生樂利，真所謂千頭萬緒，做不了的事情。必須我們能分別其本末輕重的性質，決定其緩急先後的次序，盡力實幹，循序漸進，才有成功的希望。「大學」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中庸」所謂「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管子所謂「政自小始」。都是這個道理，我們無論做什麼事，總要先擇最最基本最切要最簡易的先做好，然後由小而大，由近及遠，由卑至高，循易達難，如此進展不已，天下任何艱鉅的事業，沒有不可以完成的。

第三：迅速確實貫徹始終。循序漸進是指進行要有步驟，至於每件工作的實施或事業的推進，那一定要迅速，一定要計日成功，尅期蕙事，決不好有一點迂緩遲滯的毛病。但是僅只迅速還不相干，迅速之外，必求確實，凡事必求做得確實，然後迅速才有實效，也才能算是真的迅速，和苟且欺飾敷衍塞責不同。確實也可以說就是徹底，要做到徹底必須「信賞必罰，綜覈名實」。信賞必罰就是有功必賞有過必罰，就是公正，綜覈名實就是循名責實，嚴密考查，就是嚴明。必須嚴明公正，然後一切事業才可以做到確實，再進一步要求迅速。此外，在辦事方面還有一個要訣，就是貫徹始終，一件事務既已決定去做，一定要繼續不斷始終如一的去，做到完全成功為止。「書經」上說：「惟新厥德，始終如一」又說：「政貴有恆」。都是這個意思。

第四：守法重紀，明德修身。國家的範圍很廣，政治上的事情極多，而人心不同，人事無定，賢愚異等，才智各別，所以我們要推進政事治理國家，如果不先確立一個合理的規模和制度，根據一定的紀綱和法律來做，無論如何是做不到的。法紀制度就是政治的憑藉，失此則政治無所準據，馴至人人將各行其是，各逞其私，政治必敗，國家必亂。慎子說：「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議，士

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離也。骨肉可刑，親戚可滅，至法不可闕也。」荀子說：「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呂新吾說：「法者，御事宰物之神器。」可見法紀的作用和重要了。但是政治建設，決不是只建設好的法紀制度就可以成功，最根本最要緊的還是我們本身能够健全，有高尙的人格，優越的智慧和強毅的精神，能够真正爲一般部下和民衆的模範，盡到養民教民的職責。所以我們從事現代政治的建設，一方面要守法重紀，一方面要明德修身。爲政在人，而要能得人必先修己，一切法令也必須先能自己實行，然後可以貫徹於一般國民。所以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一方面注意明德修身，便不患無「治人」；一方面守法重紀，便自然有「治法」。法良制美而又官賢吏能，現代的新政治新國家，當然立即可以建設起來。

第五：選賢任能，講信修睦。爲政既然在人，便要選賢任能。所謂「任官惟賢才」，「徒法不能以自行」，「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以及「德必當其位，功必當其祿，能必當其官」。都是這個意思。所以政治建設的根本要務，是在訓練人才，考選人才，和任用人才。同時還要講信修睦，現在要推進政治，建設現代的國家，最必要的前提，就是要官吏與民衆，上官與部下，以及同志同事之間，推而至於全國四萬萬同胞，大家都要親愛和睦，互相信賴。孔子說「民無信不立」，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負建國的責任者格外要首先身體力行，和衷共濟，以爲部下和全國國民的模範。」

第六：注重組織，努力研究。組織是要藉縱的系統與橫的連繫，使各種事物作合理的安排與順利的進行，而達成我們理想的目的。要完成一個組織，有幾項要件必須先行決定：第一就是要決定「人」——決定以何人參加組織，或說組織需用何人。第二就是要決定「事」——決定組織內何人從事何種工作，亦即決定組織各份子分工合作的辦法。第三須決定「時」——決定某人在何時期從事某種工作。第四須決定「地」——決定某人某時在何地從事某種工作。第五須決定「物」——決定從事工作時需要何種工具及材料。第六須決定「數」——依據事業之規模與組織之範圍，將「人」「事」「時」「地」「物」五者分別統計，以期準備齊全，配置適當，而使預定之事業順利進行，理想之目的儘早達到。組織的要件和方法，大致如此。組織的要件雖有六項，然而最後最要緊的還是「數」。無論「人」「事」「時」「地」「物」，一切都要有一「數」，然後才有組織可言。「數」愈精確，使組織愈完善，效能愈強大，一切事業愈容易成功。反之，「數」若含混不確，則組織必不精密，效能必極微弱，一切事業必然要失敗。我們必須隨時隨地力求一切事物的精確，然後可以完成現代政治與現代國家所必要的一切組織。因為我們凡事要求精確，而且要精益求精，所以隨時隨地要努力做研究的工夫，尤其是對於一切基本的學問，格外要徹底研究明白，然後一切計劃才真有所本，不會有大的錯誤，一切事業也紮基穩實，可保最豐收功。

以上行政方面的六個要領，我們都能照着身體力行，國家便成爲一教成政通，風移俗易，舉國一致，精誠團結。——的國家了。

第四章 經濟思想

一 論生產

經濟的兩大部門是生產和流通。有生產而不流通，停滯起來，生產便失却生產的意義了，沒有生產，那當然就談不到流通了。在生產這一部門中，又包含有勞動，土地，資本三種要素；在流通這一部門中，也包含有分配、交換、消費三種要素。一個健全的經濟機構，必須生產能夠自足，流通能夠自動，所以健全的經濟機構的必要條件，是自足的生產和自動的流通。如何才能達成自足生產和自動的流通呢？無非加緊生產建設和流通建設而已。

蔣委員長的經濟思想，可以見之關於實業計劃和民生主義的闡論以及「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之意義及其實施」等等之中。現在根據生產和流通兩部分，來加以系統的闡明。先論生產。

上面已經說過，生產的要素是勞動、土地和資本。所說勞動，就是國民經濟建設運動所提出的總目標的前兩項——「盡人力和闢地利」。蔣委員長說：「本運動之首要急務為使人盡其才，一方面使專門人才，有貢獻能力於經濟建設之機會；一方面使有勞動力之國民，盡量發揮其勞動力於經濟建設；同時並須養成中級人員有實務之經驗與指導之能力。蓋必先人盡其才，而後地盡其利，此為我國從事國民經濟建設時所不可忽略

者也」。〔總裁言論第三冊卷五〕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之意義及其實施」頁三二三。又說「中國貧困之本身的經濟原因，就是在人不盡力，地不盡利，生產日減而消費日增，交通困難而貨運不暢。所以我們政府一方面要掃除一切足以障礙經濟發展的因素，一方面要指導人民改良生產方法，更要利用當地的民力來開闢當地的土地、富源、交通、和興辦水利。如此，則人民工作的機會可以增加；失業的問題得到解決；同時社會生產的總量亦可以增加；供求之間，得以調和；并且可以減少輸入增加輸出，使對外貿易趨於平衡，以免利權外溢。這就是我昨天所講：「以民治民」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道理。如此，在政府既屬「惠而不費」，在人民亦自「勞而不怨」，而國計民生也就由此可以充裕。所以「以勞教民富」，就是我們政治建設和物質建設的要訣。如果做政治工作的人，不能使他統轄範圍以內的部屬和人民發揮其勞力，從事生產建設的工作，致令田野不治，交通不閉，貨棄於當地，民散於四方，那就不配為現代國家的公務員。這種政治，便不是現代的政治。」〔總裁言論第一冊卷一〕總理遺教六講」頁一四三十四。在國民經濟建設勸進的實施要項第四項——提倡徵工裏，更進一步提出勞動的具體辦法來。在這一條裏這樣規定：「贊助政府實施徵工制度，鼓勵民衆參加義務勞動。尤以開發交通道路，修治水利，培植森林，開闢墾地等為徵工之基本工作。同時實施兵工政策，與徵工制并行，以軍隊補助各地徵工工務之不足，并為建設地方公共工程之倡導。」此外并加說明：「築路，濬河，築堤，墾荒等等，均為開發富源之必要條件，且需要多數勞力，宜於以徵工制度行之。吾人主張全國成年民衆均應有對國家對地方服工役之

義務，宜由政府明定一生對國家服務義務工役若干月之期限，及每年為地方服務義務工役若干日之期限。前者從事於較大規模之公共工程，後者則為其本縣區域所在農村作有關農田水利，道路衛生，公共建築等等之工作。又各地實施徵工，必先之以宣傳與訓練，而繼之以指導與實施，必須告以利益，且為準備一切（例如食物住所工具之類）。事先必有負責人員與機關為周到之設備，使時力不致延曠，勞動出於志願，則久之自成習慣矣。

●「總裁言論第三冊卷五」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之意義及其實施「頁三一四——五」

生產的其餘二個要素是土地和資本。關於土地和資本的見解，蔣委員長完全是根據總理的遺教來的。他說：「民生主義講演中關於物質建設所指示的根本政策與原則，就是要以和平的手段採（一）平均地權，（二）節制私人資本，（三）發達國家資本三個途徑，由國家通盤籌劃，全體國民協力合作來完成經濟建設，解決整個國計民生的問題。」

「總裁言論第一冊卷一」總理遺教六講「頁一五四下面引兩段總理的話來說明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的意思：

「我們頭一個辦法，是解決土地問題，就是平均地權。……講到這個問題，地主固然要生一種害怕的心理，但是照我們國民黨的辦法，現在的地主還是很可以安心的。……這種辦法是什麼呢？就是政府照地價收稅和照地價收買。……依我的主張，地價應該由地主自己去定，就是由地主自己報告到政府，政府照他所報的地價來抽稅，稅法大概都是值百抽一。……一方面可以照價收買。……地主如果以多報少，他一定怕政府照價收買，如果以少報多，他又怕政府照價抽稅。……他是不情願多報，也不情願少報，把

實在的地價報告到政府。地價定了之後，我們就更有一種法律的規定，就是從定價那時候以後，那塊地皮的價格再行高漲，就要把以後所加之價，完全歸為公有，不應該歸之私人所有。……」

「中國現在最大收入的資本家，只是地主，並無擁有機器的大資本家，所以我們此時平均地權節制資本，解決土地問題，便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們中國要解決民生問題單靠節制資本的辦法是不足的……因為外國富，中國貧，外國生產過剩，中國生產不足，所以中國不但是節制私人資本，還要發達國家資本，要解決民生問題，一定要發達資本振興實業。振興實業的方法很多，第一是交通事業，像鐵路運河，都要與大規模的建築。第二是礦產，中國礦產極其豐富，貨藏於地，實在可惜，一定是要開採的。第三是工業，中國的工業，非趕快振興不可。中國工人雖多。但是沒有機器，不能和外國競爭，全國所用的貨物，都是靠外國製造輸運而來，所以利益總是外溢，我們要挽回這種利權，便要趕快用國家的力量來振興工業，用機器來生產，令全國的工人都有工作，到全國的工人都有工廠，都能够用機器生產，那便是一種很大的新財源。」

關於節制私人資本和發達國家資本的原則，蔣委員長根據民生主義中所講的意思，再參攷本黨政綱所規定的條文歸納出下列四點：

- (一) 允許並保護私人企業；
- (二) 限制私人資本以防其操縱國民生計；
- (三) 凡企業之有獨佔性質者，由國家經營；

（四）私人能力不能舉辦者，由國家經營。

中國生產不足，所以中國貧窮；要使中國富裕，只有加緊生產建設，也只有這樣才可以發達國家資本。然而從事生產建設，許多資本從那裏來呢？總理在「實業計劃」中告訴我們要利用外資，蔣委員長也這樣說：「我們中國既是一個貧窮的國家，要想大規模的發展實業，籌不出許多資本來，所以不得不仰給於外資設法招致外國投資。當歐戰剛完的時候，外國一切戰時工業都停止了，許多大規模的機器頓歸無用，無數的技術人才大都失業。總理看到這種情形，覺得這就是發展中國實業的良機，想利用外國的機器和人才來開發中國的實業；當時中國一般人以為要發展實業，固非借外資不可，但外國當歐戰破壞以後，自求更生已感困難，又何能有資本來投在中國呢？殊不知機器就是我們物質建設最重要的資本，總理說：「夫資本者，乃助人力以生產之機器也。今日所謂實業者，實機器畢生之事業而已。是故資本即機器，機器即資本，名異而實同也，」利用外國已無效用之戰時工業機器，這是解決資本困難最好的方法。」（全上頁二七）

在生產會議訓詞中，關於生產方面，蔣委員長又提出六點指示我們：

第一、集中資本，擴張生產。生產事業，首先需要資本，我們今天要發展國家資本，獎勵私人資本，歡迎友邦資本，來擴大戰時生產。

第二、一切生產，必須以國防為中心。總理實業計劃，是一部國防計劃。生產不能脫離國防，國防不能脫離生產。

第三、發展固有生產，保持全國國民的經濟自給。我們現代生產不夠，固有的農業手工業，一定要同時振興。

第四，研究科學技術，提高生產品質。生產和科學不能分開，我們今後必須將生產和科學教育打成一片。

第五，勵行節約，蓄積建國資財。今天在萬分艱苦中，自力建設，實非勵行節約不可。

第六，勞資合作，提高生產紀錄。無論企業家勞動者，是為國家生產，是為國家勞動，勞資雙方必須精神合作，相扶相助。

這樣的加急生產建設，而後生產才能自足。

一一 論流通

上一節論生產，把有關生產的各點，大致都論述了一下。本節再進而論流通。生產品的流通，包括分配交換和消費這幾個方面，在上面也已經提到過了的。我們中國不但生產不能自足，并且流通也不能自動——交通不發達，有無不能相通，供給和需求不能調劑；生產狀況和消費狀況不能相應。所以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的總目標，除了前二項——盡人力和關地利是關於生產建設之外，後二項規定為均供求和暢流通，便是關於流通建設的了。就是要發展交通，便利貨運，使供求之間能夠調和。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的實施要項後三項，就是講流通建設的。那三項是：

(一) 調節消費——統計各地尤其農村消費品種類與數量，力謀供求之調劑，必須消費者盡量自己生產之，不能生產者盡量節約其消費。此項工作，須有當地職業團體及合作社協力進行，並須取得進口業同業公會之贊助。

(二) 流暢貨運——一方面盡量發展各縣各省區間之道路交通，改進水陸貨運，力謀貨物流通之便利。一方面設立各重要地區之主要農產品如棉、麥、米、絲、茶等之公共倉庫與運銷機關。

(三) 調整金融——鼓勵民間之儲蓄，活潑資金之融通，由政府執行健全之錢幣政策與匯兌政策，而人民衷誠擁護之。

在生產會議訓詞中，蔣委員長最後指出勤儉二字。他說：「勤儉是我民族固有的美德，也是現代富強的根本基礎。古人謂，『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勤就是艱苦勞作，無論企業家勞動者技術家都要不怕艱難，不斷創造。儉就是勤苦節約，古人謂，『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我們少數人坐生利，多數人分利，以最舊生產而供最新消費，是國窮民危的根源。」總裁言論第四冊卷七「生產與抗戰」頁三一六—七。

確實，要國富民安只有增加生產，節省消費；也只有加緊生產建設和流通建設。生產建設和流通建設完成，就是經濟建設的完成，完成了經濟建設，自然國計優裕民生樂利了。所以國民經濟建設運動提出八種實施要項：

(一) 振興農業

- (二) 鼓勵墾牧
- (三) 開發鑛產
- (四) 提倡徵工
- (五) 促進工業
- (六) 調節消費
- (七) 流暢貨運
- (八) 調整金融

要切實施行上列八項生產建設和流通建設，才能夠達到下列四六目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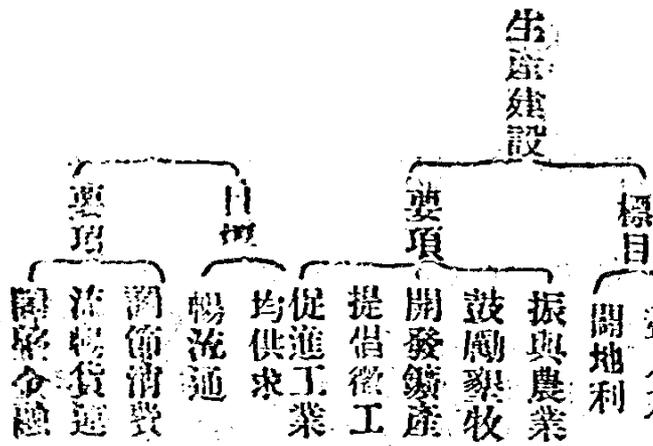
- (一) 盡人力——人盡其才
- (二) 闢地利——地盡其利
- (三) 均供求——物盡其用
- (四) 暢流通——貨暢其流

分開來說，在積極方面是要：

- (一) 增加生產總量，解決生活需要。
 - (二) 增加工作機會，解決失業問題。
 - (三) 增加輸出產品，藉謀貿易平衡。
 - (四) 保障投資安全，鼓勵生產活動。
- 在消極方面是要：

漠視經濟等等)。

最後，根據生產建設和流通建設兩大部門，把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的四大目標和八項實施要項，分列兩個表在下面，作為本章的結束。



第五章 教育思想

一 國家教育

教育是國家的事業，而且是國家最要緊的事業。教育應該以國家政治的目的為目的，教育應該養成國民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在「教育救國與救國教育」中，蔣委員長這樣指示我們：

「我覺得無論那一個國家或民族要想革命成功臻於文明興盛之域，第一件緊要的事，就是改進教育，更明白地說，就是一個國家的強弱或一個民族的優劣，並不在乎軍備之良窳或武力之大小，而完全在乎文化的開塞，教育的高低，因為文化和教育是一個國家或民族一切活力的源泉，而軍備和武力不過是一時的物質的力量，前者是生長的無限的，後者是機械的有限的，所以教育的力量是比什末武器的力量都要大。所以一個國家民族，只要他們文化和教育極良高尚，沒有不臻於文明興盛之域而繁榮進展，反之，一個民族或國家，無論他現在有怎末好的軍備，怎末大的武力，若是他的文化閉塞，教育低陋，也沒有不陷入野蠻衰敗之途而日趨沒落以至於滅亡的。」

教育的力量比軍備的力量更大，一個國家民族不怕貧弱不堪，不怕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只怕教育腐敗落伍。所以要挽救國家和民族的危亡，只有從教育上來努力，使教育適應國家的需要，配合政治的目的，激發國民的愛國思想，振作國民的民族精神。要完

成革命，要建設國家，要復興民族，首先就要改進教育。使教育成爲救國的教育，達到教育救國的目的。

現在說教育，不是教育足以救國與否的問題，而是如何才可以使教育能夠快一點奏效的問題，即是要怎樣才可以最快地用教育的力量來救中國，這便要關涉到教育的方針和方法了。蔣委員長說：

「我們要想使教育奏效，全靠我們先有一個共同一致的正確方針，和切實可行事半功倍的良好方法。否則像我們現在一般教育一樣，凌亂不堪，萎靡不振，散漫不羈，怠惰不力，教出一般八來，只知自私自利，毫無國家民族的觀念和革命主義的薰陶，最後必至亡國。如果不能改進，將來中國的滅亡，一定不亡於武器不好，而要亡於教育的腐敗。」（見「教育救國與救國教育」廿二年三月三日在江西教育討論會議訓詞）

接着便提出關於教育方針和方法的四個要點來：

第一點總理已經講得很明白，尤其是在民族主義中所指示的最關重要，而民族主義中所指示的各點中，又以恢復並發揚我們民族固有的道德一點爲最重要，所以我們今後教育方針要以民族主義爲基礎，特別注重中國的倫理哲學。

第二點，我們看到西方各富強的國家以及各個新興的國家，他們的教育都是動的教育，所謂動的教育，即是使受教的人，由動的方面來修養來進取，從動的當中獲取真確的知識，實用的才能，使他們不但能知，尤其能行，不但自己能自強不息，而且能充實社會生活的機能，推動社會的進化。他們的教育所以成功，社會所以進步，國家所以富

變，都是得力於這種很好的教育的基本精神。反觀我們中國的教育，在過去是偏於體的方面不待說，而現在的情形便根本談不到「動」或「靜」，只是凌亂散漫無精神而已。我們今後要謀改進，只有採取各國教育那種蓬蓬勃勃努力向上，學實力的一動一靜的精神，以動的教育來建設新中國。

第三點，我們看到國家的貧困和產業落後的情形，以及過去的教育因為與社會生產和勞動隔絕而根本失敗的病症，覺得「教育」「生產」「勞動」三者連貫發展的主張，是一點不錯的。今後我們的教育，必須向這方面發展。

第四點，一切教育方針和方法，都要依據中國的歷史、文化民族性，尤其是中國民族現實的環境和需要來決定，無論怎樣好的方針和方法，若是不能適合這個條件，都是行不通的，如葉勉強來行，一定是要失敗的。不僅國家的歷史文化要注意到，就是各地方，要在整個國家的教育方針和方法所指示的範圍以內，決定該地方特殊的教育方針，研究特殊的教育方法時，對於該地方的歷史文化地方現實環境也不可不注意。

本着這種民族主義的教育方針，想出切實可行最適合我們環境的教育方法，這樣的教育，是國家最需要的教育，也是國家最緊要的事業。教育既是國家的事業，要救國又非從改進教育着手不可，那末，到底怎樣去改進教育呢？在「建國的行政」廿五年五月十六日在高級行政人員會議講中，蔣委員長這樣指示我們，

「教育乃國家民族精神與文化亦即永久的生命根基之所托，所以教育之優劣成敗，即國家民族興亡盛衰最大的關鍵，近今中國教育之無精神，無內容，無效果，以及種種

根本失敗亟待改革挽救的情形。毋庸再說。現在惟一的問題，就是我們要如何負起責任來改良教育和發展教育。……我們要救國，非根本上從發展教育着手不可。而發展教育，數量的增多與普及，以掃除文盲，提高國民程度，當然很必要，但是就中國現實的情形而論，一定要先注重『質』的改良與充實，然後再謀『量』的發展與普及。因為我們國家當前嚴重的問題，還不是受過教育能夠識字的人太少，而是極少數受過教育能夠識字的人還不能成爲健全的人才，盡到救國的責任，並且以現在這樣不健全的教育，實在不能希望教出健全的國民。所以我們國家當前的迫切需要，不是要識字讀書的人多，而是要凡識字讀書的人都有高尚的人格和救國的熱情與能力，我們教出這樣一個識字讀書而能愛國救國的人才，比教出一百個識字讀書但是不能愛國救國的亡國大夫好得多。我們只要教出一個健全的智識分子，就可以領導其餘九十九個不知不覺的人來一同救國。這就是我們發展教育事業先要注重質的改良的根本原因。再則我們國家現在正當艱難締造之中，一切基礎未固，無論人才物力都很缺乏，在各種基本事業必須平流並進的情況之下，要使教育事業在量的方面有非常的發展，簡直是不可能，即或可能，也是無益處與不合理的辦法。而且我們要曉得，因爲政治，經濟，交通各種事業的發展，教育之量的發展是自然的趨勢，只要我們能真正改良教育，使今後的教育能不斷的造出健全的人才，教育一定很容易很自然的可以發展與普及。這是今後發展教育應重質不重量的根本原則。」

在目前國家的情勢之下，要發展教育來救國，根本原則是首先從事教育之質的改良

和充實。講到質的改良和充實，便不能不注意師資問題，所以蔣委員長又指示我們：

「其次，我們要改良教育，必先充實與提高師資。必須尊師重道，端養士氣，以轉移風氣，振作人心。我們今後若不能將担负教育責任者之地位與品格盡量提高，將教育澈底改善，則一切救國工作皆將無從着手，勞而無功。……教育上根本急要之問題，還不在於制度辦法與經費，而實在於師資。要提高師資，必須特別注重人格。凡有教人之責的學校教師等，無論大之在一國一省，小之在一鄉一鎮，都不僅是一個學校內的先生，實在是全社會所仰望尊敬的師長。……所以必須具有清正高尚之風格，有貞強不息之修養，剛毅不屈之精神，守道崇義，不避危害，凡遇非常橫逆之來，或專變不測之際，更要堅忍強毅，不屈不阿，足為後生之楷模，社會所效法。當此風氣淪薄，人心浮蕩，禮義不明，廉恥道喪的時候，我們挽救國難，必先挽回人心，轉移風氣。欲達此目的尤賴學校教師修德勵行，以挽回世運自任。」（『見建國的行政』）

國家民族的復興，完全要以教育為根本，上面已經說的很清楚了。今後應該本此做去，貫徹國家的教育政策，整頓教育，改善教育，一方面挽救頹風，一方面充實師資，然後教育才足以救國，而不至於以教育亡國。

二 人格教育

在上面『國家教育』一節中，已經闡明教育是國家的急務，教育的善惡會影響到國家的興亡，所以必須依據民族主義教育的方針，適應國家的需要和政治的目的，培養愛教

者的國家思想和民族精神，這樣來改進教育，以達成牠的救國的任務；同時改進教育必須先從質的充實，而後及到量的發展，而質的充實又必須注意教師品格的提高和道德的進修。

本節論人格教育，就是要討論這一點。要改進教育，首先教師自己本身要有高尚的人格，教師有了高尚的人格，而後教出來的學生也才有高尚的人格。所以教師必須教學生以做人的基本道理，學生在學校能夠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畢業出來到社會上去才會做一個良好的國民，良好的國民才會愛國家救國家。這樣的教育才算是救國的教育，救國教育的內容就是人格教育。所以蔣委員長在「教育界的責任與今後教育的方針」，「惟教育與經濟可以救中國」，「救國教育的要點」，「要造成救國的學風」這些演詞中，不惜三翻四次的要我們注重人格教育，就是這個意思。

蔣上所論，教育不能只有「教」而沒有「育」，必須「教」一育「並重，而且「育」比「教」還要重要。所以學校裏首先要注重訓育，教學生做人。蔣委員長說：「我們要講『教』的基本要義，首先，應當注重的東西就是『禮義廉恥』。我們要達到『教』的目的，要真能建設國家復興民族，絕不只在講堂裏一點書本子上的知識，使受教的人知道看書，寫字，懂得算學，物理、化學、政治、經濟諸般科學，也不只在操場上練一點普通的技術如瞄準，射擊、騎馬、跳等項；因為這些東西不過是普通的學術技能，單是教會這些科目，決不足以建設國家復興民族，這種教育不能算是真正完善的教育。真正完善的教育，一定要除這些科目以外，並且在教授一切科目之先，能將受教者教成一個

「人」，懂得做人的道理——「禮義廉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而為萬物之靈，就是因為人能得做人的道理，曉得「禮義廉恥」。若單講其他學術技能，動物和人還不是一樣，而且有時等就某一技藝來講，每每動物還要勝過人。所以我們要達成教的目的，一定要先教做人的道理——「禮義廉恥」，使受教者完成人格。如此的教育才是人格教育，人的教育，才是真正完善的教育，真的教育，才可以使受教的人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能擔當建設國家復興民族的重任，如果教育不自做人的道理——「禮義廉恥」做起，受教者雖有學術技能，不但不能救國，有時候用聰明，反而增加其作惡的能力。（《蔣總裁言論第三冊卷五「教養衛」頁一五九——一六〇）

除了學術技能之外，還要明白做人的道理，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知道怎樣做人，任憑有好大的學問，都沒有用，反而會拿他的學問去作惡。汪精衛之流的漢奸，不能說他們沒有學問，但是他們不懂得做人的道理，於是賣國求榮甘願做敵人的奴隸走狗。做人的道理是什麼？就是禮義廉恥。關於禮義廉恥在第二章「論理想」中已經闡論得很透澈，這裏不過再引幾段蔣委員長所說的話，說明禮義廉恥在人格教育中的重要。

「學術技能乃教育之末，而做人的道理即人格道德才是教育的根本。古云：『窮理盡性』，一般所謂『讀書要明理』，最重要的理就是做人的道理。所以我們講教育，一定要使受教的人明瞭做人的道理，養成完美之德性與高尚之人格為本。一定要根據總理所講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來教，這八個字再簡括起來，即『禮義廉恥』。我們此後一定要根據『禮義廉恥』來教，人能夠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受紀律，然後才算達到教育的

目的，才能完成革命復興民族」(總裁言論第三冊卷五一復興民族之要道「頁一三九」)

「我們讀書的目的是爲着救國救人的，救國救人是一樁很大的事情，要做這種大事業、首先就要明瞭做人的道理。一定要知道做人的道理，才能成功一個人。人類所以爲萬物之靈，是什麼緣故？就是因爲人類知道做人的道理有禮義廉恥。如果沒有見識，沒有學問不知道做人的道理不講禮義廉恥，不想救國救人類，不管外國人來欺侮我們壓迫我們，就是日本人來侵略我們，我們也不覺得恥辱，也沒有一點知覺，便不能算是一個

人，更不能算是一個國民。爲人要爭氣，要爲國家爭氣，要爲民族爭氣，要爲祖宗爭氣，我們要爭氣，就先要把自己修養成一個人；如果不能立志做人，那末賣國可以做，漢奸也可以做，種種不肖的事體都可以做。這樣就是衣冠禽獸，是賣國賊，只配做外國人的牛馬奴隸。所以教育的目的，首先就是要我們認識自己的父母祖宗和國家民族，認得做人的道理，自己努力做人。但怎樣才能做人呢？就是要有禮義廉恥。教師教導學生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使一般人能夠知道禮義廉恥。中國所以多窮，民族所以落後，致受各國侵略壓迫，是什麼道理？就是在我們中國人把最好的道德最好的立國精神，也就是個人和國家的靈魂完全喪失了！我們國家的靈魂是什麼，就是一禮義廉恥。」……以後我們教育的目標，第一要養成一個有禮義廉恥的國民，就要使個人能懂得禮義廉恥，知道愛國。」(見「教育界的責任與今後教育的方針」廿一年十二月七日對武漢教育界學生訓話)

看了上行兩段話，可見禮義廉恥在人格教育中的地位和重要了。若用現代的術語來

說，那末禮義廉恥就是組織紀律。禮義就是組織的精神，廉恥就是紀律的精神，沒有禮義，組織就不能存在，沒有廉恥，紀律就不生效力。有禮義然後有組織，有廉恥然後有紀律；教育需要組織和紀律，更需要禮義和廉恥。教育以禮義廉恥為本。禮義廉恥是側重精神修養方面的，需要進一步將這種精神修養的禮義廉恥應用到實際生活上面來，即是貧衣住行四項基本生活上來，使得人人的日常生活都合於禮義廉恥。所以教師應該本着禮義廉恥的道德精神，教導學生曉得怎樣吃飯，怎樣穿衣，怎樣住房子，和怎樣走路。總之，先要使學生具備基本生活的修養。如果沒有基本生活的修養，即使基本生活資料如何充足，也不會有健全合理的生活。

關於這一點，將委員長說得非常明白。他說：「無論你有怎樣好的衣，怎末多的飯，怎末高大的洋房。如果不知清潔整齊衛生的道理，隨時隨地就可以生病，享不到健康和暢快。試問糊糊塗塗過生活，隨時還要生病，那末，就是有再多的飯，再好的衣，再高的房子，再大的馬路，又有什末用？何況一般國民如果不能有基本生活的修養，社會和國家永遠是紛亂，不能建設起來，永遠不會有充足的的基本生活的資料呢？所以我們不必先講要有飯吃有衣穿有屋住有路走，先要教好一般人知道吃飯知道穿衣會住屋子會走路。先有了基本生活的修養，然後才能有健全合理的生活。大家或許以為中國人那一個不能吃飯，穿衣，住房子和走路，何必再要來教呢？其實不然。我可以斷言，普通至少十個中國人有九個不會穿衣，不會吃飯，不知道住屋子應當如何住，走路應當如何走，無論一舉一動，統統不成一個樣子。比方講吃飯，坐的坐，站的站，蹲的蹲，食具零亂，

吃飯以襍弄得菜湯飯屑狼藉滿地，使人家走過身也不敢走。這那裏好說是會吃飯！豈不是和野蠻民族一個樣？再講穿衣，中國不論有什麼好的衣服，總是不整齊，有扣子也不扣，穿得很髒還不換洗，其他或是穿紅穿綠，穿得不成一個東西，那裏好講中國人會穿衣？再講普通中國人所住的房子，走進去總是滿屋的塵土滿地的穢物，到處都是臭氣，尤其是對於衛生關係重大的廁所和廚房格外帶得不堪！這種住法，那怕是再高大的洋房，那裏好算是人住的地方？至於走路和一切行動，中國人格外不會，無論在甚麼地方，大家只要稍微留神去看就可以知道，十個人中至少有九個走路的時候彎着腰駝着背低着头，兩個眼睛向下看，三點精神和正確的姿勢也沒有，完全不像一個人走路的样子！其他一切行動，無論坐、立、敬禮等等統統不像樣！尤其是一般的儀容態度，生活習慣，實在太不行！所以認真的說：中國人十個就有九個不會穿衣吃飯，在屋走路。我們一定要隨時隨地以身作則來教導一般青年學生和一般人民，使他們都能懂得食衣住行四項基本生活的要領，從而實踐禮義廉恥，涵養高尚之德性與人格！」（總裁言論第三冊卷五「復興民族之要道」頁一四一—一四三）

個個學生都能够明禮義知廉恥，重組織守紀律，無論是食衣住都能够做到整齊清潔，而一切的行動態度又都正直，那末所謂人格教育才算完成。蔣委員長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也就是要提倡「禮義廉恥」的規律生活，以「禮義廉恥」之素行習之於日常生活——食衣住行之中。新生活運動可以說就是人格教育運動。

要完成人格教育，必須從校長教師自己修德勵行，以身作則做起。蔣委員長這樣告

訴我們：「我認爲現在要想改造教育，首先就要由我們校長和教師的人格做起。這人格的效能比往來都大。所以一切救國的方法，惟有以教育最快當最有力，而人格教育的效功更比一切教育都快當重要。古語所謂「不言而教」，有許多時候，無形無聲之間，可使得一般學生受了很大影響，所以現在根本上要改造教育就要改造我們教師的人格。這幾年來，罷學罷課，弄得舉風掃地，這責任完全在我們教師，尤其是在我們校長。這幾年來，不僅教員本身怠課，而且利用學生罷課，這樣人格不但不能作師表，而且不能算是一個國民。教師如此，學生當然要輕侮教師，甚至要對教師打罵交至。這都是因爲教師的人格沒有具備，就是古之所謂「師風」，至今已掃地盡了。」（見「救國教育的要點」廿一年十月十八日對武漢教育界訓話）

校長教師如果不能潔身自愛，用自己高尚的人格感化學生，教學生做人，那結果的不堪設想，誠如蔣委員長所說：「現在各地教員自強自重不媿爲青年師表者固然很多，但因循敷衍或造就學生迎合青年，只求保持個人地位，不惜喪失師道尊嚴者，亦所在多有。此種放棄責任徇私自利之教師，不但是自貶其人格，實在玷辱了神聖的教育事業，更有甚者，竟至利用青年虛矯浮動的弱點，視爲把持擾亂之工具，以謀自己個人的出路，這種誤人子弟，貽害青年，破壞教育之行爲，實與出賣民族永久之利益無異，其罪惡猶尤甚於賣國的漢奸，充其禍害，真足以斷送吾次代國民而陷中華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境。」（見「建國的行政」）

只有校長教師首先自己明德修身，把自己的人格健全起來，在無形無聲之間，注意

做訓育的工作，用自己的人格來訓育學生感化學生，培養學生的國家觀念，民族精神，公共道德以及做人實際生活的道理，造成學生的完全的人格，而後人格教育才算成功。學生都明瞭淺知廉恥，知道做人的道理，具備高尚的人格以後，這才會確定他的人生觀，精神上才會得到一個安定的歸宿，而後教他一切高深的學問，他才能聽得進學得會。這便是古人所謂的一居之安，然後資之深。『如果他居之不安，怎末能够使他資之深呢？』所以要造成一個學生，能够為國家民族效力，一定先要使他的精神意志能够安定有歸宿。而後能够安心求學。這樣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不是一教一而不育的，而是特別注重訓育的。這才是救國的教育，從學生人格的培養到學術技能的獲得，這樣的學生必然知道愛國救國。

在最近勸勉全國大中小學校長暨教職員文中，對於此點，蔣委員長更有懇切的說明：『國家民族之前途，繫乎國民之品質，而健全的國民之培成，則唯我主持各級學校之校長職員是賴。中正於去年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開會時，曾痛切闡述此理，期望我教育界同人一致接受三民主義，發揚我民族固有道德，尊崇師道，注重訓育，堅定全國抗戰之意志，樹立積極建國之精神，以充實我國悠久豐富之生命力。尤特別致意諸君以陶冶國民人格為教育界之基本任務。在會議前後更復規定禮義廉恥為共同校訓，宣佈以黨員守則十二條為青年守則。同時召集四川省中等以上校長及訓育人員舉行會談，以確立服務的人生觀與發揚國民建國精神相期勉。……特就我教育人員指導學生思想品性，增進學生體格精神之責任，再為諸君詳切言之。……就當前之環境而言，在

意志集中精神振奮之今日，始為陶鑄國民品性，領導國民前進之最後機會，而就國家之前途以言，亦唯有乘此時機，統一國民之目標，健全國民之思想，俾吾全國在學之青年，咸有開拓國家未來運命，擔當戰後復興責任之能力。……切望我大中小學各級學校校長與教職員諸君毅然肩負指導學生思想，陶鑄學生品性，管理學生生活，鍛鍊學生體力，健全學生人格之責任。須知知識技能之傳習，僅佔教育功能之一部，若不灌注以愛國家愛民族愛同胞之精神，課之以負荷民族興亡與完成國民革命之責任，教之以認識時代認識本國正視世界遠矚未來之意義，賦予以銅筋鐵骨能任一切困苦艱難之體格，而振奮其持久努力之志氣，則藝能之獲得，得使隨環境而流轉，或墜此以荒棄，而決無補於國家。……各級學校對於學生在思想方面，必須負責領導，力戒脫離現時之空想，力戒僥倖成功之幻想，使之以致認識國民革命事業為中國數千年來民族生存意志之表現，從而對建國原則之三民主義確立生死不渝之信仰。在品性陶冶方面，必須以共同校訓與青年守則為依歸，造成其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之共同習慣，更為發揚我民族固有道德，教以舍己利羣為人生最初之本務，宰制宇宙創造未來為人生最高之意義，而尤以光大我中華民族之歷史，為中華國民共具之志氣。在生活指導方面，則必教以節約，教以勞苦，教以鍛鍊體格，教以堅忍奮鬥，教以謹嚴整肅，教以迅捷確實，教以嚴守紀律，服從法令，庶不愧為現代國民之一員。其他課外讀物與課外活動之指導督率，公德公益之重視與互助合作習慣之養成，更必須隨時隨地，以父母督教子女同樣之辛勤，進而為親切周到之監護，學生與校長教師晨夕接觸，起居與共，未有不漸染薰漬而底於感化

者。」

教育爲救國之本，人格教育爲教育之本。人格是一切學術技能的根本，教育應以養成學生的健全人格爲第一義。有了健全的人格，才有崇高的精神，人格是精神的最高表現。人格教育也可以說就是精神教育，明禮義知廉恥，重組織守紀律，好好吃飯，好好穿衣，好好住屋，好好走路品性端方，行爲正直，要有國家觀志和民族思想，這一切都是屬於精神方面的。蔣委員長極注意這種人格或精神教育，他創辦各種訓練班訓練團如廬山訓練團峨嵋訓練團以及現在的中央訓練團等等，調集黨政軍警各界幹部訓練，就是要把他們訓練成爲有高尙人格和健全精神的人，作爲建設國家復興民族的基礎。訓練的時間至多不過一個月，訓練是一種急進的速成教育，在這樣短促的時間內，當然學不到甚麼學術技能，主要的是側重在精神訓練和人格陶冶。這種訓練主義的教育就是人格的教育，就是精神教育。人格或精神教育的基礎雖是個性的，而牠的最高表現却是團體性，人格或精神教育的結果如不能發生團結作用則其教育必是失敗。所以要注重人格或精神教育，就是要使人人有一個主義一個組織一個領袖之下，集中意志集中力量，爲國家民族而奮鬥。

三 文武合一教育

我們中國古來的教育原是文武合一的，絕對沒有劃分出文武的界限來，古人教人都是文事和武藝並重的。我們讀中國歷史，凡是歷史上鼎盛的朝代，沒有不是文化和武功

並盛的，若有文化而無武功，或有武功而無文化，國家決不會臻於強盛之域，或者只是一時的強盛而不克持久。國家的強盛，是文武合一教育的結果。

反之，文武分途，不但得不到完全的人格和學問，而且會弄得亡國滅種。像現在的中國，就是吃了文武分途的大虧：武人不懂文事，恃強凌弱，粗暴無禮，甚至養兵自重，割據稱雄，鬧得國家四分五裂，不像一個樣子；文人不習武藝，彎腰駝背，弱不勝風，被譏為東亞病夫；這樣文武分途，甚至重文輕武，結果便招致了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和壓迫。

蔣委員長說：「可是現在一般文人不懂得這個道理，討厭武人，以為武人專是講武，沒有智識，以殺人為事，一聽到全國軍事化，就驚疑莫定，那裏曉得真正的武人是最有組織最有紀律和訓練的。武人必具備『智信仁勇嚴』武德的。可見武事實包含文事，真正的武人一定通達文事。我們古來的教育本是文武合一的，並沒有絕對分出文武的界限，這一點我昨天已經約略講過。你們看中國的舊戲劇，文官大概都是佩劍的，這就是文武不分的一種表證。所以武人不重文事，固不成其為真正的武人；文人如只講文事而沒有武德，不修武藝，亦不成其為真正的文人。現在一般文人誤認文人是不必習武知兵，甚至厭惡武人，養成今日頹廢懦弱的風習，喪盡忠勇尚武的精神，國家因此積弱不振，受人家的壓迫。所以我們懲前毖後，對症下藥，只有竭力使全國國民軍事化，恢復尚武的精神。」（總裁言論第三冊卷五「全國總動員的要義」頁二九四）

蔣委員長是反對文武分途，重文輕武的，他主張文武要並重，他提倡文武合一教育

。文武合一教育，是蔣委員長教育思想中的重要的一環。那末，文武合一教育的內容是怎樣的呢？根據蔣委員長關於教育方面的言論，可以歸納出下列三個要點：

(一)發揚智信仁勇嚴的武德；

(二)和自然界奮鬥，鍛鍊體魄；

(三)教習禮樂射御書數六藝。

關於第一點——發揚智信仁勇嚴武德，在第二章「倫理思想」中已經論述得很詳盡，這裏不必再贅，僅將第二第三兩點予以論列就够了。和自然界奮鬥，可以鍛鍊身體和精神，有了健全的身體和精神，而後才能努力一切事業。究竟怎樣和自然界奮鬥呢？蔣委員長在廬山訓練一般剿匪軍官的時候，曾經提出一個口號：「日光，空氣水。」意思是說：「我們一個人的生活，應當與烈日，嚴寒、酷暑、狂風、暴雨、大雪、深水等一切自然奮鬥，來鍛鍊強健的體魄和堅忍的精神，然後才可以成功我們的革命事業。現在我們中國的軍人，只知道風和日暖的時候出操，操完之後就到營房裏面休息閒談，天冷時候就要搨火，連門外都不敢出去，所以一般軍人的體魄和外國的軍人比起來，真有天壤之別，不知道要差多少。軍人尚且如此，一般國民更不待說了。我常常講體魄的衰弱，是我們國家和民族根本的危機，如果不能趕緊想法子補救，大家再不能振作精神，鍛鍊體魄，今後不但要亡國，而且還要滅種！反之，只要我們能照我所提出的「日光，空氣，水」這個口號，奮發精神，與自然界奮鬥，來鍊成功強健的體魄和堅忍的精神，那末，我們科學技術雖不如人家，物質經濟雖趕不上人家，亦不要緊，還可以拿們我體力精

神來和敵人奮鬥到底，一定可以自存自立！不但以後沒有那個人敢壓迫我們，侵略我們，而且看了我們就要敬而且畏。所以我們今後無論天氣怎末熱，怎末冷，雨雪怎末大，我們都不可害怕，而且愈是在嚴寒酷暑暴雨颶風的時候，愈要抖擻精神，愈要努力工作，愈要能利用非常的時機來衝鋒陷陣！大家要曉得，人之所以為萬物之靈，就是因為有改造環境，克服天然的奮鬥精神和創造能力，只要我們能發揚這種高尚的精神和偉大的能力，什末天然的險阻艱難，都可以克服！（見「利用天然」——二十三年九月廿六日在軍官團之精神講話）

其次，關於禮樂射御書數六藝，蔣委員長說得更明白，「我們先生教學生，不僅是教他的學識技術，尤其要使他們能立德做人。而且一定要先從做人的道理教起，然後其他一切的教育才能收效，一切的學術技能才能有用。所謂做人的道理，就是一禮義廉恥。」四維；而基本教育的課目，就是以前孔子拿來教學生的所謂「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禮」就是講禮節，「樂」就是講歌樂，「射」在古時就是講射箭，現在就是講準射擊，「御」在古時就是講駕車騎馬，現在更包括駕駛飛機，「書」就是講念書寫字作文，「數」就是講計算。這六藝雖同為基本課目之內容，但是無論孔門講六藝與管子倡四維，都以禮為首，可見禮是為學與做人的第一要件，亦即基本教育之中心。至於書數之學術，還在最後，乃是技藝之末。但是現在普通學校的教育，却舍本逐末，只知注重書數，將其他最重要的禮樂射御四種基本，尤其是禮，看作不重要，甚至於完全廢棄。以為只要使受教的人會讀書，寫字，作文，算數，便已盡教育之能事，辦教育的人便覺得心滿意

足。其結果造出一班不文不武不三不四的人，使國家社會形成一種卑鄙自私，頹廢散亂的風氣。即使少數學生能够學得多少學術技能，亦適足以欺世盜名，濟奸作惡，使國家社會未得其益，徒蒙其害。這就是由普通學校不注重基本教育禮樂射御四藝，尤其忽略了禮的陶冶之所致。亦正因為這個原因，所以現在中國的學校，趕不上中國古時的學校，現在中國的人，更趕不上中國古時的人，現在的中國，所以趕不上古時的中國了。（見「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二十三年八月八日出席軍官團升旗典禮訓話）

這一段話是說明六藝的意義及其重要，僅僅這樣說明還嫌不夠，蔣委員長再進一步將禮樂射御書數，加以更詳盡的詮釋。他說：

「禮」為合理的態度與規矩，即古人所謂「事之治」，所以立身，所以防亂，故為人生一切之本。軍人尚禮，而後有紀律，成為節制之師。「樂」為音樂歌曲，所以陶冶性情，振作精神，養成高尚人格，其重要不特關於個人的修養，且可影響於國家社會的興替，軍隊中有軍樂軍歌，在平時可以和洽軍心，調暢意志，在戰時尤足以激勵士氣，振作軍威。法國革命時代的馬賽革命歌，可與拿破崙的功業同時彪炳古今。歌樂對於國民教育和軍事教育的重要，由此可知。其次，講到「射」，在古時是講射箭，是一種文武通習的修養精神與人格的武藝。到現在槍砲發明，射字乃指射擊而言，工具與技術雖已不同，而「射」的意義和重要仍無二致。再其次講到「御」字，「御」便是講騎馬，駕車，現在飛機發明，駕飛機亦包括在「御」字之內了。「御」者，駕御控制事物之謂，自廣義而言，就可以包括人類全部的智能，由狹義言，專指活動工具的駕駛，亦是

現代國民，尤其是軍人必要的技能。此外「書」與「數」兩者，是指關於文學和計數的種種技藝，這是普通一般人都知道要注重的。不過書數究竟是技藝之末，不如禮樂射御之重要，尤其是不如禮之重要。徒然會寫幾個字念幾本書，懂得一點外國文，知道一點計算的方法，還不能算是一個完全的人，更不能算是一個軍人！現在有很多禽獸，經過訓練之後，居然也知道算數，所以要以能寫會算來區別人和禽獸，現在已不正確。而人與禽獸之分，就是在於知禮與否，人之所以為人，就是在於知禮。但是，現在一般學校裏的學生和軍隊裏的軍人，都不知禮，這種學校所培養出來的學生和軍隊裏所訓練出來的軍人，還能算人嗎？還能夠期望他們來盡忠國家抵禦外侮嗎？！這六藝的含義很廣，不是短時間內可以講完的，而必須靠自己已去仔細研究。例如就「射」來講，古人習「射」的用意，並非以能夠射死鳥獸或敵人，便算是好本領，也不是單單以命中為達到了習射的目的，而是要藉以鍛鍊和比較各國人的精神和德性。在以前用射箭來比較，到現在我們就用射槍來比較，現在之所以要特別規定「射擊軍紀」就是和古人同一用意，不僅要練技，尤其要養德，要練心練神。古云「射有似乎君子，失之正鵠，反求諸其身」。又說「射之弗中也，弓無罪，矢無罪。這就是說，如果射而不能正中目標，就要反躬自問：爲什麼別人可以命中，我自己不能？或是由於自己的心未定，意不專，目不正？或是自己手沒有力，射的時候顫動不定？或是由於自己的目力太差，看不準目標？一件一件都要反躬自問，求之於已，絕不能怪人家，亦不能說工具不好。總要細究失敗的原因，改正自己一切的錯誤。這種一切反求諸己的訓練，就是「射」之所以能練德最重要

的一點。其次，古人無論講射與御，都以禮為前提，所以比賽射的時候，雖然有所爭，但爭還是有禮的，惟其是為禮讓之爭，而非權利之爭，為養德之爭，而非鬥氣之爭，所以為君子之爭。古云，「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又說，「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禮記射義云，「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上下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隘直，然後持弓矢審固，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他們這種爭的意義，不是爭什末權利，而是爭各人的品格，射之而中，就可以表示自己的心神是專凝鎮定的，志氣最精一安詳的，人格是正大光明的。反轉來說，一個人如果時常習射，時常比賽，他的心神意志必能日益專精，他的品格德性必能日趨高尚，無形中得到最大的進步。……（見「軍人應確定三民主義之中心信仰」）

中國過去二三十年來的教育，完全沒有注意到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上面來，結果，我們的精神不行，體力不行，一般國民如此貧弱愚笨，國家受到如此的奇恥大辱。今後應該趕快覺醒，恢復古代的教育方法，注重禮樂射御書數六藝，把文武合一起來把教育武裝起來，造成軍國民教育，達到全國軍事化的目的。這樣，才能將「東亞病夫」的恥辱，一切國家民族的恥辱，洗刷得乾乾淨淨。

第六章 軍事思想

一 戰爭認識

戰爭是破壞的，是摧毀人類文明的魔障，是一種罪惡。
戰爭是建設的，是促進人類文明的動力，是一種本能。

對於戰爭的認識，不外有上述兩種。蔣委員長是承後一種見解的，他認為戰爭是生存必需的本能，是從遠人類文明的動力，宇宙萬物都是為戰爭而生，在一軍人應確立革命的人生觀（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出席軍官團紀念週講）中，他是這樣的發揮他的戰爭哲學：

「我有一句話，常常和一般將領說的，『宇宙萬物，皆為戰爭而生，故從事戰爭必要盡利用宇宙萬物。』無論一草一木，一山一水，虫聲鳥音，電光月色，以及一切事物，無不可用之於戰爭；正惟戰爭的關係，才能特別發揮一切事物的效用，而促進人類的文明。自古以來，人類社會的文明，可說都是戰爭的產物，每經一度戰爭文明便有一次進步，所以有一無戰爭必無進步」之說，這是很合理的。例如我們古代的樂器，最初是怎樣發明出來的呢？就是因為戰爭造出了弓箭，當箭由絃上出的時候，絃上就發生一種音調，有緩有急，有純有發，由是便發明了一種絃琴。至於近代的一切物質文明的進步戰爭的影響之大且易明顯。在平時一切的研究發明，有意無意都是為了戰爭，而一經戰爭，研究發明更是要增加。不僅在物質文明一方面如此，就是在人類精神與社會思想各方面，也都是如此，而且在現在的弱肉強食的世界，人類因為互爭生存，戰爭終歸

是無法可以逃免的。如果沒有戰爭本能的民族，便沒有生存的可能。所以我們如果要想保護我們民族，以求永遠繼續生存於世界，便非有戰爭的本能不可，必有戰爭的本領，才可以救亡圖存，復興民族！」

確實，一部世界史就是一部戰爭史。自上古中古以迄於近代歷史上的大紀載無非是「戰爭」兩個字。戰爭破壞了一切舊的，建設起一切新的。因有不斷的戰爭，才有今天的歷史，世界才有今天的進步。人類進化的中心是爭生存，爭生存要有爭生存的手段，這手段就是戰爭，戰爭是本能的。戰爭既是一種本能，那末怎樣發揮這種本能的力量呢？蔣委員長又這樣告訴我們：

「所謂戰爭的本領，最要緊的一點，就是善於利用天然，來發揮我們的精神與物質的力量。換句話說，就是利用天然，來發揚我們戰鬥的精神，提高我們軍人的人格，充實我們戰爭的資源。這些道理，做上官的人，一定要使一般部下和一般國民人人能够澈底瞭解。近年以來，許多人不但忘了戰爭的重要，不知道戰爭之必不可避免，因而晏安怠惰，懦弱萎靡，暮氣沉沉，醉生夢死，甚至厭惡戰爭，恐懼戰爭，反對戰爭，致使整個國家民族弄到在這樣積弱頹唐，被列強來凌侮壓迫，而不能抵抗，岌岌可危。今後我們一定要以身作則，來挽回這種頹風，要使全國國民都能深切的瞭解，戰爭是個人以至整個國家民族圖存最要的本能，沒有這種本能，便不能生存。這個道理，首先要使一般部下認識，再對駐在地週圍的學校社會青年民衆，一村一鄉的去宣導勸勉，務使一般國民都能够改變以往懦弱萎靡因循麻木的習性，養成剛毅勇敢自強自立的風氣，與利用

天然以達戰爭之目的種種技能，使能與軍隊共同一致負起國家民族生存亡的責任。」
（見「軍人應確立革命的人生觀」）

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但這並不是說既然愛好和平，就可以不要戰爭。越愛好和平，越要具備戰爭的本能。一旦和平被破壞的時候，我們就要為保衛和平而戰爭，一旦祖國被侵略的時候，我們就要為保衛祖國而戰爭。我們是以正義戰爭消滅野蠻戰爭，以自衛戰爭消滅侵略戰爭。這樣才能發揚我們民族固有和平美德，才能保障我們國家的獨立生存和世界人類的文明幸福。

蔣委員長是這樣的指示我們認識戰爭。

二 治軍要領

治軍練兵，最要緊的是上官對於部下，應該同時「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蔣委員長常說，軍隊是國民模範學校，軍官是這個學校的教師，一般的部下就是這個學校的學生，同時軍隊不僅是一個學校，也可以說是一個家庭，軍官不啻是部下的父母。所以做了一個軍官，就兼備了上官父母和教師三種資格，同時負了統率養育和教導三方面的責任。這用古人的話來講，就是同時要「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

現在引用蔣委員長的話，分別把這三點加以申述：

「作之君」——你們做了人家的上官，對於部下，居於統馭督率的地位，就有監督指揮的職權。不過雖然是以上臨下，最要緊的，還是自己人格高尚。大公無私，對部下務

必賞罰嚴明，才能做到恩威並濟。能以人格爲部下表率，而又能恩威並濟，才能使部下心悅誠服，樂於用命。如此才不失了「作之君」的道理。你們不要以爲自己的階級比較部下高，就可以和以前那般作威作福的官吏，對待老百姓的態度一樣，便耀武揚威，驕恣傲慢，一味地來欺侮他們，壓迫他們，不把他們當人看待！以往的軍官，往往犯了這個毛病，失了「作之君」的正道，以教官長與士兵之間，沒有一點「親愛精誠」的精神，所以上下官兵都是離心離德，不能共同一致。這樣來統帶軍隊，也就和專制魔王統治一個國家一樣，必不能維持長久，最後一定要弄得衆叛親離，分崩離析，我們現在既是做了人的一個上官，便應當懂得「作之君」的道理，對部下不可濫用威權，亦不可稍以放縱，總須照着「賞罰嚴明恩威並濟」八個字的要訣做去，才不愧爲人之長上，才可以帶出好的兵來。」（見「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

「作之親」——「我們軍隊既是一個家庭，做官長的就是部下的父母，例如連長就是一連的父母，營長就是一營的父母，推至團長旅長師長，就是一團一旅一師的父母。父母對於子女，因爲子女的生活能力不夠，就要教他，所以教養就是做父母對子女應負的責任。故前人有云：「慮其愚蒙無知也，則教之誨之；慮其飢寒苦痛也，則愛之護之；慮其放蕩無行也，則懲責之；慮其不克發達也，則培養之；無論爲寬爲嚴，爲愛爲憎，爲好爲惡，爲賞爲罰，均出之以至誠無僞，行之以至公無私。如此，則弁兵愛戴長上，亦必如子弟愛其父兄矣。」我們軍官既是部下的長上，處於家長的地位，便應該以父母對子女那種慈愛的心腸，來對待部下。這就是「智信仁勇嚴」的武德中之「仁」字，

和總理教我們革命軍人「親愛精誠」的精神。我們軍官能够抱着這個至誠來愛護部下，指導部下，部下自然要感戴五內，樂於效死！然後才能得兵心，才能使部下畏威之外，更能懷德，死心塌地來服從你，矢志不渝來報答你！這種上下同德，萬眾一心的軍隊，就是所謂父子之兵，那天下有敢與你對抗的敵人嗎？」（同上）

「作之師——」軍隊就是普通國民的模範學校，我們軍官就是這個國民模範學校的教師，我們先生教學生，不僅是要教他的學識技能，尤其要使他們能立德做人。因此我們教部下的基本教育，不僅基本學術之講授，同時要注重品德的陶冶，教他做人的道理。而且一定要先從做人的道理教起，然後其他一切的教育才能收效，一切的學術技能才能有用。所謂做人的道理，就是「禮義廉恥」四維。而基本教育的課目，就是從前孔子拿來教學生的所謂「禮樂射御書數」六藝。（同上）

要帶出好兵來，練出勁旅來，除了上述同時要「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之外，還要注意六項原則，四大要素，三旬口號，二個要旨，和一個要訣。

什末是六項原則？六項原則就是「偵探」、「搜索」、「警戒」、「連絡」、「掩護」和「觀測」。「偵探」是軍隊的耳目，要早派多派遠派。「搜索」警戒「務求周密」連絡「無論從高級司令部以至前哨部隊之縱的連絡，以及前後左右各部隊之橫的連絡，都要力求靈便確實。」掩護「部隊要預先配備好適當的位置，在左右兩邊山嶺交番躍進，才能萬無一失。」觀測「第一就是觀測地形物，第二就是要擇定有利的目標來打。這六項原則必須時時刻刻記在心裏，時時刻刻預備齊全，檢查清楚才可以相信自己的軍隊有戰勝的把握。

什末是四大要素？四大要素就是「確實」、「迅速」、「靜肅」和「秘密」。『確實』就是無論命令動作，言語舉止，一切都實實在在，不可有一點虛偽浮薄的弱點。怎樣才能做到確實呢？無論什末事，一定要心到口到眼到手到足到，才能够確實。同時確實又是一切的根本，無論什末事不管你做得多快，做得多好，如果不能確實，總是無用的。『迅速』就是一切的動作要快當，有精神。『靜肅』就是要整齊嚴肅，萬幕無譁。一定要先能做到的實在，然後才能求迅速；一切動作能迅速，然後才能求靜肅。『秘密』是軍中唯一要求，但必須先做到以上三種要求，而後才能真正的秘密。『確實』、『迅速』、『靜肅』、『秘密』是軍隊教育和一切活動的四大要素，必須一齊做到，才算是軍隊教育的成功，才算是一個好軍隊。

什末是三句口號？三句口號就是「受傷不退」，「被俘不屈」，和「受命不辱」。

「受傷不退」就是我們雖然受了傷，還是要奮勇殺賊，尤其是一般軍官更要以身作則。

「被俘不屈」就是萬一不幸被圍做了俘虜，無論如何不為敵人所屈服，寧可犧牲生命，萬不能受敵人一個錢，飲敵人一口水，這樣才能保持革命軍人的人格和革命軍的氣節與精神，才能對得起總理和已死的一般官兵。

「受命不辱」就是對於命令，一定要當作自己的生命一樣敬重，所以受命人受了這個命令，一定要實實在在做到，而能不辱使命。這三個口號，不僅是當官長的一定要切實做到，並且要使部下個個士兵都能够做到。

什末是二個要旨？二個要旨就是「分散」和「集合」。戰術的內容雖然極其複雜巧妙，但可以用這兩個要旨來包括一切，一切戰術不外乎分合二字。教練士兵就是要注意

這兩項事情，對於分散和集合的動作格外要做得多，尤其要做得快，要集合馬上集合，要分散馬上分散，愈迅速愈好。但是僅僅做到迅速還不夠，一定要實在，要靜肅，不然，雖然迅速也還是沒有用的。

什末是一個要訣？一個要訣就是「服從命令」。服從命令是打勝仗最要緊的一個秘訣，除此以外，沒有可以打勝仗的道理。無論那一個官長，一定要養成「服從命令」的習慣，自己以身作則來教部下，使得個個官兵都知道自己的生命就在命令裏面。要保存并發揚我們的生命，只有絕對服從命令，能服從命令，就可操必勝之權。

總之，從之君，作之親，作之師，以及六項原則——偵探，搜索，警戒，連絡，掩護，觀測，四大要素——確實，迅速，靜肅，秘密，三句口號——受傷不退，被俘不屈，受命不辱，二個要旨——分散，集合，一個要訣——服從命令，這些都是治軍的要領。必須具備這些治軍要領，而後方能够練出精兵來，兵不在多而在精，所以在治軍方面，蔣委員長又曾提出他的精兵主義來。他說：

「兵不在多而在精，古今中外無數的事實可以證明。我們今後整理軍隊，絕對應重質不重量，絕對不必求單位多，而要求每一個單位的內容充實，力量足夠。大概你們沒有不願意所帶的部隊能够戰鬥力增強與充實。我告訴你們，惟有裁減兵額，縮編單位，然後方能充實內容，改良素質，才是增加戰鬥力惟一有效的辦法。如果再要像過去一樣，表面上擁有十數萬之衆，若干師若干旅，只是鋪張得一個空架子，實際上餉械缺乏，精神渙散，這不過是離心離德的幾萬烏合之衆的飢軍，一點也沒有力量，不僅不能作戰

，且將不戰自亡。我們與其有一軍一師的飢軍，還不如有一團一營的勁旅。我們有一團精兵，就可以打敗人家一師烏合之衆。」（見「剿匪與整軍之要道」，——二十四年六月五日在成都行轅對四川各高級將領訓話）

三 軍紀含義

關於軍隊紀律的問題，蔣委員長講得最多，而且講得最具體，最精微，最詳盡，這裏，根據他所講的，分爲下列五點來研究

- (一) 軍紀的重要
- (二) 軍紀的要素
- (三) 軍紀的本質
- (四) 軍紀的根源
- (五) 軍紀的整肅

第一，軍紀的重要。軍紀的紀字有兩個解釋，一是「紀律」的紀，一是「紀綱」的紀。所謂紀律，就是用法律來維持人羣的秩序，保持社會的系統，所謂紀綱，就是前人所說的三綱五常，要長幼有別，上下有序，階級次第，分得明明白白。軍紀的紀字，實含有紀律和紀綱兩層意思，但是軍紀的主要意義并非一定要用法律來維持秩序，而是用紀綱的精神來做軍紀的基礎。所以說，「軍紀者，軍隊全體心理所公認的規範也。」軍紀是要大家來維持的，是以軍隊中全體人員心理上所公認的規範，來統一各個人的意志

和各個人的行動。軍紀是全體所公認的，守軍紀就是守大家公認的規範。軍隊有了這個規範，才能維持軍隊的秩序，保障命令的系統，以資格的深淺，階級的上下，節節相制，有條不紊。軍紀是這樣的重要。軍紀簡直是軍隊的命脈，軍人的靈魂，一個軍隊組織成功的唯一要素就是軍紀。能夠支持戰爭，取得最後勝利，也全在一個軍紀。軍隊爲什麼叫做軍隊呢？普通的土匪也有槍，民團也有槍，有許多還是穿着軍服的，他們爲什麼只能叫民團或被稱爲土匪，而不叫做軍隊呢？軍隊之所以爲軍隊，就因爲他有軍紀，由軍裝武器和紀律合起來，才能稱是軍人，才可以叫做軍隊。軍隊之所以和別的有武器的人不同，就是因爲他有紀律，有節制，上下一致，節節相制，即是所謂「節制之師」，那才稱得是一個軍隊。沒有紀律，便不能算作軍隊，即是烏合之衆，軍隊的力量也就完全沒有了。因此，我們軍人要講軍紀，軍紀就是軍人的命脈。

第二、軍紀的要素。軍紀的要素有三：一是人格的影響，二是情分的交感，三是一致的精神。什末是人格的影響，就是自己要做自己的意志，盡忠自己的職務，對於紀律更要尊重，一切奉上對下都要以身作則，抱定志向，爲主義犧牲，爲國家效死，百折不回，死而無怨。軍人的人格是最要緊的。有了人格，軍紀才可以成立。如果上下都有高尚的人格，部下信仰上官，上官信任部下，同時每個人也都有自信力，各人自愛自重，推己及人，這樣共同一致的規範便形成了。什末是情分的交感，軍隊中以連或隊爲戰鬥單位，連或隊就是兵卒的大家庭，連長或隊長就是家長，全連隊的官兵或學生就是兄弟，凡一切起居飲食，冷熱寒暑，官長要時時留心部下，使學生或士兵不致有病，勞逸適宜

大家親愛精誠，共甘苦，處患難，同生死，官長愛護部下，部下也體貼長官，恩威並濟，賞罰嚴明，使軍隊如同一個大家庭，都有一種濃厚真摯的感情，感情交流起來，就能和衷共濟，大家推心置腹，一切都不會發生打格的現象。這樣，共同一致的規範，就都聽遵守了。什麼是一致的精神。一致的精神是由於一致的志操得來的，比如作戰的時候，數十萬數百萬的軍隊，在極長的戰線中，法律不足禁士兵爲非，官長監視的能力也不能生效，這時軍紀的保持就全靠各個人共同的志操，一致的精神，不要法律束縛，不用官長監督制裁，各自發揮忠誠愛國冒險犯難的精神去犧牲奮鬥，這就叫一致的精神。牠發生的根基有四：一是歷史的民族的傳統精神——三民主義，二是偉大人格的力量，三是學問技術的鍛鍊，四是人事系統的整齊。

第三，軍紀的本質。軍紀進行的程序約有兩派主張：一派主張由外而內，就是先從形式上整頓，然後再到精神，這一派佔多數，如德國英國等都是；一派主張由內而外，就是只注重精神的培養，對於形式不大注重，如法國和蘇俄就是這一派。我們是主張前一派的。要由外表形式的訓練，進而至於精神的訓練，由外而內，逆流而入，形成我們的軍紀，比方新學生或士兵入伍的時候，先要穿整齊一律的服裝，起居飲食要有一定的時刻，一律的規定，內務要清潔劃一，種種衣食住行甚至洗衣拿筷等事，都要有一定的規則，統統要照規則做。操場動作從立正稍息起更嚴格要求一致，這都是由外面形式上做工夫，使得深入精神之內。形式上如能一致，精神上也漸漸趨於一致，所以軍隊一定要嚴格，形式上一定要整齊，全軍精神才可以貫注，腦筋才可以純一，個人的行動及

心意都是一致，達到全軍一致的地步。由於軍紀進行程序的兩派主張，而對於軍紀性質的見解也分成了兩派：一派以服從為主體，一派以個性為主體。比如法國的軍紀就以發展個性為主體，主張由內而外由精神而形式的，目的在激發全軍人員的名譽心和愛國心，鼓勵他們高尚的企業心犧牲心和必勝的希望心。但是要達到這個目的，服從仍是很重要的。軍隊的自由是在公認的規範以內的自由，並非越出規範去發展個性。所以我們認為軍紀的性質，是以服從為體，以個性為用，以服從為體的軍紀，同時並不輕視個性，且要注重個性的發展才好。總要使得全軍的人員有思想有獨立的能力，作戰的時候，就是指揮官傷亡了，各兵卒仍能依其愛國自愛的心理來自動地戰鬥而操其必勝之券。所以軍紀的性質，是以服從為體，個性為用的。

第四，軍紀的根源。軍紀的根源究竟在什麼地方呢？普通都以為軍紀是用很嚴厲的軍法來維持軍隊秩序，這實在是不正確的。法律和道德心只可算是軍紀的成分之一，決不能作為軍紀的根源，因為法律僅在事後發生效力，事前並沒有力量，道德心也只能發生一時的熱烈情緒，若果在作戰疲勞，熱情降低的時候，道德心也會漸漸消失。軍紀的意義不單是使人不作惡不犯罪而已，也不是要人一時衝動，而是要隨時隨地都能循規蹈矩，那末軍紀的根源在法律道德以外，應當別有所在。這根源是什麼呢？就是由於三信心而來的。對上官信仰，對部下信任，對自己自信，有了這三種信心，全軍上下就無論在什麼地方時候，終可確信他的長官他的部下他的戰友不會私自逃跑或是貪生怕死，並且它也能始終自信可與全軍同志共甘苦處患難同生死，而達到克敵致勝的目的。但是三

信心又從什麼地方發生的呢？這就是以三民主義爲中心，三民主義就是革命軍軍紀的根源。有了共同的主義，才會信仰上官信任部下相信自己，全體一致爲實現主義而革命建國，奮鬥犧牲，不達目的不止。這種信仰主義至死不變，精誠團結志操一致的人，就是守軍紀的人。這種從主將到兵卒，思想一致，行動一致，意志堅強，團結堅固，不怕危險，不怕犧牲的地方，都是從軍紀發生出來的效力。

第五，軍紀的整肅。整肅軍紀的方法，可以提出如次的幾個原則來：（一）要清潔整齊；（二）要有秩序條理；（三）要確實，不論事的大小，都要精密審慎，不可敷衍草率；（四）要提倡誠篤的風氣，切戒虛浮或誇張詭詐；（五）要親愛精誠，和衷共濟；（六）要靜肅秘密。

四 作戰要訣

在「民族戰爭取勝的要訣」（廿三年八月廿五日出席軍官團第二期畢業典禮訓詞）中，蔣委員長指示我們六項作戰的要訣：

- （一）立於主動地位
- （二）必求指揮統一
- （三）精神勝過物質
- （四）注重修養四育
- （五）熟練技術戰術

(六) 變換戰鬥精神

第一，我們作戰，總要隨時隨地立於主動的地位。如果失了主動地位，而陷於被動地位，那麼任你軍隊怎樣的衆多，軍器怎樣的精良，必要失敗。怎樣才算立於主動地位呢？普通一個人每以爲進攻便是主動，退守便是被動，其實這是大錯的。不僅取攻勢要主動，就是取守勢的時候，也要是主動的，有計劃的，不是因爲受敵人壓迫才取守勢的，不僅防守要主動，就是退却也是要主動的，這就是不要因爲被敵人壓迫而後才退却。我們或攻或守或進或退，都要有一定計劃，出於自動的戰略運用。所以「主動」云者，並不限於進攻攻勢，只要有計劃，有準備，總是一觸敵而不制於敵，「自動」而不被敵所動，無論攻守進退都是主動，我們要能克敵制勝，無論攻守進退皆要立於主動而後可。我們對外作戰，因爲物質武器不如人，當然以取守勢爲原則，但絕不可陷於被動。必有一定的計劃與目標，要攻我們的敵人，爲我們所制而陷於被動地位；而我們自己必須始終進退自如，攻守自在，保持主動的地位。但是或攻或守或進或退，總以當時當地戰爭情況來決定，也並不是一定取守勢。然而無論爲攻爲守爲進爲退，無論在戰略上或在戰術上，都一定要取得主動的優勢地位來左右敵人，不可陷於被動的劣勢地位，而爲敵人所左右。

第二，我們要能立於主動地位以爭取最後的勝利，其方法雖不能詳細來講，但是有一個基本的條件，就是要指揮統一。作戰的時候，無論是取攻勢或取守勢，無論前進或後退，必要在一個政府一個統帥之下，服從一個命令，在一個計劃之下行動。命令要我

們前進，就要不顧一切的前進！命令要我們後退，就要不顧一切的後退！命令要我們一營一團一師人孤守一個地方，甚至要令我們犧牲在那個地方，就要不顧一切的固守或決心犧牲在那裏！命令就是發揮戰鬥力量，爭取最後勝利的惟一要素。如果命令不能統一，人自為戰，行動既不一致，力量更不集中，格外談不上什麼作戰計劃！如此當然會陷於被動的地位。所以作戰的要訣為取得主動的地位，而達到主動地位的要訣，則要在一個政府統治與一個統帥命令之下！也必須如此，才能萬眾一心，萬人合力，才能挽救國家的危亡，達到戰勝的目的。

第三、精神可以戰勝物質。無論那一個被壓迫的民族，在反抗帝國主義的壓迫，爭取民族的自由獨立的鬥爭中，雖然在物質上講，被壓迫民族的軍隊既沒有精良武器，又沒有定期的訓練，一切都不如帝國主義國家的軍隊，但只要真能團結自強，一定可以取得最後的勝利，達到最後的目的。土耳其復興，美國獨立，蘇俄的成功，都是被壓迫民族戰勝壓迫的國家，和劣勢軍隊可以戰勝優勢軍隊顯著的實例。而其所以能致勝之故，全在他革命精神的力量。因為一個民族的復興，必有其不可壓迫的民族精神，而這種精神之所以能發揮出偉大的力量來達成他民族復興的目的，又全在領導民族復興運動的領袖，和在領袖指揮之下的一般幹部，一般將領，能忠義自矢，服從命令，擁護領袖，為國犧牲，團結精神，共同奮鬥，我們對外作戰，一切物質武器不是勝利的第一要件，而比物質更見重要的，這是民族的精神，革命的精神。如果沒有精神，雖然兵多糧利，亦終歸失敗。唯精神的力量才可戰勝一切！

第四、以上所論作戰致勝的要訣，都是就戰言戰，現在再要補充說的一點，就是除一切物質與戰術戰略等項之外，還有一個致勝的基本要件，就是智育，德育、體育、羣育。這四種東西較之飛機大炮還要重要，應當努力修養，儘量充實。所謂智育，就其內容而言，乃泛指一切學術的修養，就其作用而言，就是總理所講的「軍人之智在乎別是非，明利害、識時勢、知彼己」。軍人的德育，就是要發揚武德——智信仁勇嚴，有了武德就可以發揮出一種超絕的精神的力量，戰勝敵人。至於體育，我們的體格，不必需要任何物質，只要能隨時隨地注意鍛鍊，一定可以強健起來，有了強健的身體，便有健全的精神，也就是有了戰勝敵人的一個基本要件。所謂羣育即是統一意志，團結精神，確實做到全民族或全軍「共同一致」的地步，萬衆一心，羣策羣力的來救國，如果大家能以國家的存亡看作自己的存亡，大家能够共患難同生死，自然可以戰勝敵人。

第五、注重基本技能與戰術的熟練。技能是作戰的基本要件，雖有精良的武器而無使用武器的熟練技能，武器必失其效用。反之、武器雖不精良，若技能嫻熟，必能充分發揮其效能，較之徒有精良武器而無熟練之技能者，其得失不言可喻。精良的武器，不如嫻熟的技能。再講到戰術，也是一樣的道理。戰術上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立於主動地位，無論進退攻守，悉由自主。又因為我們現在武器不如人，不在我們的步槍有效的射擊範圍以內時，決不輕發一彈。一定要沉着勇敢，強迫敵人在近距離與我決戰，才能發揮我們技能的特效，而取得勝利。這是被壓迫的國家報侮的基本戰術。

第六，發揮戰鬥精神。怎樣才能發揮戰鬥精神呢？必須：

(一)發揚正氣——我們爲民族爭生存，爲國家求平等，不成功便成仁，此爲軍人最光榮最痛快的光明大道。所以平時須使部下認識當軍人的目的和生命的意義，打破他生死關頭，確立革命人生觀。

(二)強固戰鬥心理——我們做中級以上官長的人，要了解戰鬥心理，否則，貿然指揮作戰，定歸失敗。所謂戰鬥心理，就是說：「如果我們怕敵人，敵人就不怕我們，反之，如果我們不怕敵人，敵人就要怕我們」。所以我們一定要使部下不要存怕敵人的心理，要有大無畏精神，才能勇往直前，壓倒敵人。

(三)激勵敵愾心——這是振作士氣的妙訣。如果我們帶兵官不能引起部下對敵人的敵愾心，雖有充足的物質，衆多的部隊，都是沒有效用的。我們如何激勵敵愾心呢？這就是要我們在平時以我們的精神人格，來感動軍心，以大義正理來激勵士氣，使一般部下在不知不覺中對敵人發生痛恨絕惡的情緒，立下不共戴天的決心，自發的不顧一切去和敵人拚命。

以上所論作戰的要訣，是將委員長在民族戰爭之戰術戰略上給予我們的寶訓。

第七章 結論

蔣委員長的全部思想，在上面六章裏總算扼要的論述過了。蔣委員長說：「我們更澈底，研究總理的遺教，一定要從根本上先懂得總理的哲學。總理的哲學就是民生哲學。總理主義的思想系統，是以民生爲指歸。以民生爲中心來解決一切問題，所謂「民生

歷史的中心」，就是全部三民主義最基本的原理」（見前）我們也可以這樣說：「我們要徹底研究蔣委員長的思想，一定要從根本上先懂得蔣委員長的哲學。蔣委員長的哲學，就是力行哲學。蔣委員長的思想系統，是以力行爲指歸。以力行爲中心來解決一切問題，所謂「古今來宇宙之間只有一個行字才能創造一切」，就是蔣委員長全部思想最基本的原理」。

而蔣委員長的力行哲學，自然，又是淵源於總理的孫文學說和民生哲學，加以發揚光大，才產生出來的。有了這力行哲學做思想的基礎，而後建築起他的倫理思想，政治思想，經濟思想，教育思想，和軍事思想等等的體系，其中處處顯到「行」字沒有離開過「行」字。「大學」論三綱八目，「中庸」論不偏不易和善怒哀樂的中和，忠孝仁愛禮義和平八德，禮義廉恥四維，以及智仁勇信嚴等德性，都不是空言所能做到的，必須在生活上來實踐，充實國家的生命力——教育經濟武力，教養人民使成爲堂堂正正的人，爲人民謀福利，做到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的地步，實行仁政，注意行政的方法，提高政治的效率，這些都需要各級行政人員的努力篤行，才能收到實效的。充實國家的經濟力，解決人民生活臻國家於富強之域，必須從事經濟建設——振興各種實業，發展水陸交通，增加生產，調節消費，調整金融等等，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便是實行總理實業計劃之初步的備後行的方案。要救國家必先從改進教育着手，教育不能僅僅教學生在課堂裏讀幾本不着實際的死書就算事的，必須注重「雙手萬能」，注重勞動和生產，尤其要注重大格教育，從生活和行動方面訓育學生成爲一個良好的國民，

同時提倡文武合一教育，造成軍國民主義，達到全國軍事化和總動員的目的，這就不是靜的死氣沉沉的教育，而是動的朝氣勃勃的教育。至若治軍作戰，更非「行」不可，而且要行得確實，迅速，肅靜，和秘密。蔣委員的倫理，政治、經濟、教育軍事等思想，都是從他的力行哲學這個中心發揮出來的，只有力行才能完成革命，建設國家，復興民族，增進全體人類的幸福，促成世界文明的進步。總之推動整個宇宙不斷的向前進展。力行是樂觀的，利他的，積極的，革命的，建設的。

蔣委員長的哲學脫胎於總理的哲學，蔣委員長的全部思想自然也脫胎於總理的全部遺教。蔣委員長研究總理的全部遺教，歸納為心理建設政治建設物質建設和社會建設四大部分。心理建設包括「孫文學說」，「軍人精神教育」，和「民族主義」第六講中關於固有道德和固有智識的一部分。政治建設包括「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大綱」，「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物質建設包括「民生主義」，「實業計劃」和「錢幣革命」。社會建設包括「民權初步」和「中國國民黨黨章」。心理、政治、物質、社會四大建設，將總理重要遺教都包括在內了，在「總理遺教概要」裏，蔣委員長說道

「總理第一部最重要的遺教，當然是三民主義。三民主義乃革命建國的最高原則，諸如孫文學說，實業計劃，民權初步，建國大綱等等可說都不過是實現三民主義之具體方略。再就三民主義的內容分析起來，我們可以大概的說：民族主義為心理與政治建設的原則，民權主義為政治與社會建設的原則，民生主義則為政治與物質建設的原則。」

而言之，三民主義即為統攝心理，物質，政治，社會四大建設，以完成國家建設，即整個國民革命之最高指導原則。」（總裁言論第一冊卷一「總理遺教六講」一頁四）

在「研究總理遺教之結論」裏，又總結出研究總理遺教所得的八項精義：（同上頁二二一—二五）

（一）總理全部遺教係以「民生」為中心，以「仁愛」為基礎。

（二）三民主義乃盡善盡美惟一最高之革命指導原則。

（三）建國方略為實現三民主義最偉大最精實之方案。

（四）總理全部遺教乃國民必備的常識，應作一切教育的基本課目。

（五）三民主義的新中國，乃「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之真基礎。

（六）總理遺教中所指示我們的一切革命建設，都是以充實國力，建立現代的新國家為總目標，而一切充實國力建立國家的的工作，又是以國防為中心，以武力為根本。

（七）我們要實行總理遺教，必須竭力發展教育，經濟和武力。

（八）我們大家要自信，中國決不致被人來滅亡；更要相信，中國既有生像總理這樣偉大的革命家，留下許多革命的遺教和歷史，便是中國不亡的保障。

同時又說：「大家要曉得：無論是做人，革命，建國的道理，無論政治，經濟，教育，社會各種根本辦法，在總理著作中，都已切實指示我們了。可惜現在一般人都切實拿來研究，因此不僅無以知總理之偉大，亦不能明瞭革命建國的要緊方法。尤其可痛

心的，在教育方面，大家還不知道一切教育應以總理遺教為基本課目，而使一般受教育的人，都能了解遺教來切實力行。因此現在教出來的學生，大都不成其為現代的國民，現代的新國家也不能真正建立起來，甚至弄到現在這樣危急存亡的局勢。從今以後，我們一定要竭力補救這個缺點，必須實實在在將總理遺教貫注於一切教育之中，使全國國民都能深切認識，篤信力行！」（同上頁二二三——四）

蔣委員長的思想系統，就是根據他研究總理遺教的這些心得所構成的，以總理遺教為最高指導原則，來發揮做人，革命，建國的道理，提供政治，經濟，教育，軍事各種根本辦法。他的哲學思想，倫理思想，政治思想，經濟思想，教育思想，軍事思想，和總理遺教的心理建設，政治建設，物質建設，社會建設，是息息相關完全一致的。哲學思想倫理思想和教育思想可以包括在心理建設裏面；政治思想可以包括在政治建設裏面；經濟思想和軍事思想可以包括在物質建設裏面，因為實業計劃其實就是一部國防計劃，同時一切建設也都要以國防為中心，都要與軍事有關，而社會建設又可包括倫理思想，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

蔣委員長的哲學思想。倫理思想，政治思想，經濟思想，教育思想，軍事思想，再歸納起來，也就是他時常講的，作為建國之基本要務的「管教養衛」。「哲學思想」，「倫理思想」，「政治思想」裏面所講的，和「管」有關係；「教育思想」裏面所講的，和「教」有關係；「經濟思想」裏面所講的和「養」有關係；「軍事思想」裏面所講的和「衛」有關係。「哲學思想」，「倫理思想」，「政治思想」，「經濟思想」，「

教育思想，和「軍事思想」裏面所講的，換言之，無非是心理建設，政治建設，物質建設，教育建設，和武力建設。完成了政治建設，達到「管」的任務，完成了教育建設，達到「教」的任務；完成了物質建設，達到「養」的任務，完成了武力建設，達到「衛」的任務，而完成「管教養衛」的任務，它的先決條件却又在乎精神建設，打破「知之非難行之惟艱」的謬說，確立「知難行易」之方行的哲學觀念，而後一切事業才易成功。

管教養衛這四項建國要務的提出，也是以三民主義為依據的。民族主義包含「衛」的要務，缺乏民族意識和民族精神，是不會有抵抗侵略保衛民族的決心和勇氣的，抗日自衛戰爭的順利進行，全靠這民族意識和民族精神的激勵和發揚。民權主義包含「管」的要務，缺乏民權思想，不知運用民權，是不會管理國事的。民生主義包含「養」和「教」的要務，不解決民生四大需要的食衣住行，是談不到養育人民的；除此四大需要以外，還有一「育」和「樂」兩種需要，這在總理雖然沒有詳細講到，但是從他生平의 言論和著作中，可以體會出來；所謂「育」，包括「養育」和「教育」兩種意義，不過關於「養教」一層，「食衣住行」中已經包括無遺了，總攝於「食衣住行」之外再提出「育」來，一定是專指「教育」而言；至於「樂」，乃是止富娛樂的意思，可以調暢心脾，教人樂觀積極，如各種俱樂部，電影，戲劇，音樂，圖畫，競技，運動等等，都是正當的娛樂，古人論教育有所謂「禮樂射御書數」六藝，「樂」居第一位，「射」和「御」，「射」和「御」也是取好的娛樂，凡是正當的娛樂，都是含有教育的意味的。

基本上所論，我們便可澈底明瞭：蔣委員長是總理的繼承者，他的思想自然也是總理思想

的繼承，他的思想體系的形成，是完全依據總理的全部遺教為最高指導原則，用以繼承總理的未竟之志，完成革命建國，促成世界大同，增進宇宙人類的文明和幸福。

本社新書預告

下列書目，有半數已付印刷，三月內可陸續出版。餘或正在審改，或在編著中，半年內可陸續出版。

一、特刊書類：

1. 論中國共產黨
2. 毛澤東評傳

李麥麥著

鄭學稼著

二、新中國文化叢刊：

1. 唯物史觀與民生史觀
2. 日本史鳥瞰
3. 日本的軍需工業
4. 戰時救護工作
5. 生存，戰鬥，與文化

繆鳳林著

繆鳳林著

許興凱著

黃震著

李旭著

三、新中國文化叢書：

1. 國父遺教概論

鄭元端著

四、民族統一運動叢書：

2. 中小學訓育的理論與實踐
3. 各國青年訓練之理論與實際
4. 中國社會之史的認識
5. 民族正氣文選
1. 尼德蘭獨立運動史
2. 德國統一運動史
3. 意大利統一運動史

陸覺先著

張培德著

李旭著

謝國馨編

鄭學稼著

李建芳著

李建芳著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新中國文化叢書第一輯
蔣委員長的思想體系

每冊定價國幣玖角

(外埠附加運費隨貨)

編著者 殷作楨

印刷者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西安香米園德化里

發行者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西安香米園德化里

